

「新福音派主義」(New Evangelicalism) 與羅馬天主教拉上關係，這一點是最有力不過的證據，證明它已經破產；同樣，葛培理也與天主教保持親密的交往，這是最清楚不過的證據，證明「新福音主義」經已失落了。

葛培理與 羅馬天主教

Issues Facing the Churches

雲大衛 著

(By David W. Cloud)



葛培理與 羅馬天主教

雲大衛 著
吳主光 譯

種 籽 出 版 社

SEED  PRESS

CAT. NO.5112

本社自此書原著者取得全球中文本出版發行權，凡未經取得本社書面許可，無論部分或全部，均不得轉載或翻印；但書評中引用則不在此限。

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

原 著：雲大衛

譯 者：吳主光

出版兼
發行者：種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442號

電話：(852)2720-3670；(852)2380-9864

傳真：(852)2728-0399

電郵：info@seedpress.com.hk

網址：www.seedpress.com.hk

國際種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130-11100 Bridgepo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T2, Canada.

Tel.:(604)233-6655 Fax.:(604)233-6656

封面設計：湛禾廣告及設計公司

承印者：種籽出版社印務組

二零零三年一月 初版

※版權所有※

Billy Graham and Rome

By David Cloud

Translated By David C.K.Ng

@Copyright 1993, 2000 David Clou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by **Seed Press Ltd.**

P. O. Box 72442, Kowloon Central, Hong Kong.

Tel.: (852)2720-3670; (852)2380-9864

Fax.:(852)2728-0399

E-mail : info@seedpress.com.hk

Website: www.seedpress.com.hk

International Seed Press Inc.

130-11100 Bridgepo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T2, Canada.

Tel.: (604) 233-6655 Fax.: (604) 233-6656

Published by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Seed Press Ltd.**

First Printing : January, 2003

Cat. No.5112 ISBN 962-230-212-2

Printed in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譯序	1
引言	5
羅馬天主教有改變嗎？	6
新福音派主義	8
葛培理何時開始妥協的？	16
葛培理被警告多次	28
逐年觀察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關係的進展	39

譯者序

關於佈道家葛培理信仰變質的報導，坊間已經出版了許多種雜誌和書籍，其中有厚達八百頁的作品，例如由Cathy Burns博士著的"Dr. Billy Graham and His Friends : The Hidden Agenda"一書（讀者可從www.cuttingedge.org 查看參考），也有散文性的報導。但是「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Billy Graham and Rome）這本書的作者「雲大衛」（David Cloud），將葛培理從1950代出身以來，逐年與天主教交往的事例，一一簡報，卻是最簡要性的報導。叫我們很容易就得到眾多非常清楚的證據，證明葛培理的信仰已經變了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推諉。

其實一個像葛培理這樣，出身於信仰純正的浸信會，後來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佈道家，如今變了質，實在是一件叫人感到十分傷心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我們感到不便宣揚，免得叫主名受羞辱的事。但是，為了挽救教會脫離邪惡的「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和挽救千萬信徒，免得他們被天主教異端思想迷惑了，以致中了仇敵魔鬼的詭計，為末世敵基督和假先知鋪路，我們就不能不將這些資料翻譯和發行出版，喚醒神的眾教會。

要知道，整本聖經充滿了警告我們、勸我們不要容讓異端的教訓。例如：在舊約，十誡中的

第一誡就嚴嚴地警告我們，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後來，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的事件上得罪神，摩西呼召肯向神悔改的利未人，拿刀殺了拜金牛的弟兄三千，神就因為利未人有忌邪的心，所以賜他們事奉神的專利權；往後以色列人又因為中了巴蘭先知的詭計，被米甸的婦女引誘去行淫，和拜巴力比珥，耶和華神就在一天之內，用瘟疫殺了他們二萬三千人，直到亞倫的孫子非尼哈用鎗殺了一對姦夫淫婦，瘟疫才止住。在這事件中，因為非尼哈有耶和華忌邪的心，神就與他立平安的約，叫他的後裔可以世世代代當祭司；以利亞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在迦密山上，與四百個巴力先知鬥法，將他們殺了；以色列和猶大之所以亡國，是因為他們離開了耶和華神，轉去隨從別神，和拜諸般的偶像……。

到了新約，雖然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了，聖經仍然以最嚴厲的警告，叫人不可以改變福音和神的話語。例如：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太5:18-19）；保羅也對加拉太教會說：「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

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6-9）；他又教訓哥林多教會說：「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轡。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6:14-18）……。

聖經既然有這麼多既明確，又嚴厲的教導，要我們與異教分開，為甚麼這個世代許多有名的傳道人，偏偏要與異端聯合，惹神的忿怒呢？千多年以來，天主教不是殺盡神眾多的僕人嗎？歷史上，豈不是所有的神學家都定天主教為異端嗎？天主教現今豈不是仍然不肯放棄異端的信仰，而且還與世上各種宗教聯合，企圖要做世上所有宗教的最高領袖嗎？現今福音派的神學家豈不是依然反對煉獄、功德、馬利亞神學、藉彌撒不斷將基督獻為贖罪祭、向聖餅崇拜、藉聖禮來維持信徒的救恩、為死人做彌撒、向死了的聖人禱告、主教無誤導誨權柄、聖經以外加次經、聖經與遺傳和信條同為信仰最後根據……等教義嗎？然而，在葛培理的影響之下，我們親眼看見普世極多福音派領袖，與天主教簽署聯合宣言。我們知道，聖經預言末世必有假先知起來，迷惑

普天下的人（參啓12:9, 13:12, 16:14）。這是說，末世必有「教會大合一運動」，甚至最終會進展成爲「宗教大合一運動」。目前，我們看見葛培理竟然成爲基督教當今最有力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的人物。他的影響範圍和深遠的程度，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因此，筆者認爲這本書是人人必讀，喚醒人心，叫人在這末後時代，能作一個忠心和儆醒的僕人的好書。

引言

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

雲大衛著

(By David W. Cloud)

「邀請一位未信主的羅馬天主教徒去聽福音聚會是一回事；但是，去參加一個依然忠於羅馬天主教信仰的神父主講的聚會，卻又是另外一回事。」

(《Christian News》1988年6月26日)

「新福音派主義」(New Evangelicalism) 與羅馬天主教拉上關係，這一點是最有力不過的證據，證明它已經破產；同樣，葛培理也與天主教保持親密的交往，這是最清楚不過的證據，證明「新福音主義」經已末落了。

羅馬天主教有改變嗎？

有一些人聲稱，羅馬天主教已經改變了許多，我們不應該再說她是異端。不錯，六十年代舉行的第二次梵蒂岡會議確實改變了天主教許多，但她的基本教義依然是沒有改變。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不但繼續堅持天主教的錯謬，而且還變本加厲地將之強化。那一次會議，數以百計的主教們再度確認天主教的異端思想，例如：藉聖禮得救、教皇無上權柄、羅馬僧侶制度、基督不斷在彌撒中被獻為祭、羅馬天主教傳統與聖經被視為同等權威、馬利亞被尊為天后，和協助基督完成救贖工作的女救贖主、告解懺悔禮、馬利亞神學、到「神聖的神龕」朝聖、煉獄、向死人和為死人祈禱…等。

所有這些異端思想都被第二次梵蒂岡會議確認，成為天主教最新、最具權威的信仰宣言。教皇約翰廿三世在會議一開始之時，就這樣說：「今次舉行的教會大合一會議，我們最大的關注是保衛教會一直以來所積存的教義不變，叫眾信徒更有效地遵守。」由此可見，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並沒有改變羅馬天主教的基本教義。

雖然今天有一些天主教徒聲稱，他們不再相信羅馬天主教那些異端教義。但他們仍然不能夠改變一個事實，他們一天不離開天主教，一天還是接受羅馬天主教的管轄。如果一個天主教徒不肯相信天主教教會所定規的教義，他就必須離開天主教教會。

關於羅馬天主教的錯謬教義，我們在《福音派與羅馬天主教》(Evangelicals and Rome)一書中，已經引述過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和《天主教最新要理問答》(New Catholic Catechism)許多資料，將之揭發出來，讀者可以自行閱讀參考。

天主教所教導的，確實是異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神吩咐所有基督徒都要離開異端，這也是事實。因此，當那些福音派領袖們與羅馬天主教保持相交，他們就是直接地得罪神，違反聖經的教訓。聖經明說：「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羅16:17)

新福音派主義

可惜，今天「福音派主義」這詞，不再是用來堅決維護新約聖經信仰的名詞。已故的夏露奧肯加（Harold Ockenga）發明了「新福音派主義」這詞，為要給新興的福音派主義下一個定義，好與往日原有的福音派主義劃清界線。奧肯加對今天的福音派主義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為他是「美國全國福音派聯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創始人，同時也是富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創辦人之一，也曾經一度出任富樂神學院院長一職。他也是「世界福音派團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第一任主席、是「葛培理福音協會」（Billy Graham Evangelical Association）的董事、《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的董事會主席，亦曾一度擔任過這份雜誌的總編輯。他曾為夏露蘭西博士（Dr. Harold Lindsell）所著的《為聖經而戰》（The Battle for the Bible）一書寫過序言。就是在這本書裡頭，他解釋「新福音派主義」的立場，說：

「『新福音派主義』的誕生，可以說是與我在1948年，在帕薩丹納（Pasadena）的城市演講廳（Civic Auditorium）所發表的演講詞有關。當時我在演講中，一方面承認基要信仰主義的神學立場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卻指出，基要信仰的教會觀、和社會觀，也是錯謬的。我呼籲大家要棄絕分離主義，又呼籲人人都要參

與社會關懷。結果我的呼籲得到許多福音派人士熱烈的回應。……『新福音派主義』與『基要信仰主義』很不同，因為『新福音派主義』放棄分離主義，又肯定今天不同宗派之間的神學對話是有價值的。再者，『新福音派主義』還有一個新重點，就是將福音的應用放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實際的生活上，使福音顯得更有意義。」

今天，奧肯加和許多新一代的福音派領袖（以葛培理為最為突出的代表），都定意要棄絕最重要的聖經立場；反而他們所重視的，卻是神學對話、理性主義、和討好主義。他們認為，保留自己在各種異端宗派教會中做斡旋工作的機會，是最有意義的。聖經所教訓的分離主義是要不得的。高舉「新福音派主義」的領袖們願意與傳異端的人對話，卻不肯勇敢地起來，傳講出於神絕不妥協的話。「新福音派主義」喜歡與擁有高學術學位的人權主義者，和自由神學主義者會面，卻不肯為基督的緣故，在神面前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是愚拙的，只有靠著神的話語才能站穩立場。「新福音派主義」的領袖們又推動「反思程序」，要藉著這種新方法、對準新的方向，重新審核聖經信仰的教義。

神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間。」（耶6:16）但「新福音派主義者」卻認為「古道」必須重新審核才可以

接受。神說：「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箴22:28）。但「新福音派主義者」卻偏偏要將這些信仰地界一一挪移。神說：「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弗5:11），但他們卻強調，與不同信仰的人結交是有需要的。神說：「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加5:9），但「新福音派主義者」卻認為，他們可以改良已經發酵的麵團。神說：「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林前15:33），但「新福音派主義者」卻認為，如果「善行」可以將「濫交」昇華，這樣就不算是「濫交」了。神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5:5），但「新福音派主義者」卻認為，若要傳福音給他們，就不能不在他們看為驕傲的事上，與他們同得一樣學術和學位，不然就無法與他們接觸。

結果，這種新思想為基督教帶來極大的悲哀。在短短的四十年間，過往福音派主義純潔、能力、和榮耀的外觀，全部失去。換來的「新福音派主義」卻是叫人眼瞎和赤身露體。而且更嚴重的，就是他們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未能醒覺。因為「新福音派主義」的領袖們正在享受著自己廣被世界許多背道教會所接納、物質上的豐富、人造衛星的轉播、各大電視台和無線電台的廣播、出版和銷售所帶來的利益、萬人大會上的榮譽和地位。

末世的特徵就是背道

今天，我們親眼看見，真理與謬誤之間的牆垣，在我們這一代中就被拆除了。當然這是一件可悲的事，但我們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因為使徒們早就預言到，這是末世時代必有的離道反教、與異端妥協、靈性大衰退、教義大混亂、和宗教大欺騙的事。請留意這一類經文：太24章、帖後2章、提前4章、提後3至4章、彼後2至3章、猶大書和啓13及17章等等。其中的預言早已繪畫出，教會會在歷史的流程上，漸漸變成背道的教會。並且發展到末世，在主耶穌基督榮耀和權能的降臨之前，勢必成為以虛假的教會大合一運動作為背道的最高峰。

過去的一千九百年來，教會歷史已經證實這一點。到了現今我們這一代，我們更可以親眼看見，大背道又再邁進一大步了。不但絕大部份從前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教各大宗派教會，現今紛紛重新返回羅馬天主教的懷抱，即使是一些從前一向都沒有與羅馬天主教來往的教會，現在也深陷其中，喝醉了邪淫的酒。

「福音派主義」已經衰微，最好不過的證明是她與羅馬天主教日益拉近關係。過去，福音派的衛道士都一致地指出，羅馬天主教教會就是大淫婦。那時，絕大部份福音派的神學家都認為，若有人承認羅馬天主教是真教會，他就會被視為可恥。這不是說，過往的福音派神學家都憎恨天

主教徒。其實正好是相反，因為他們都熱愛天主教徒的靈魂，所以他們才有這麼大的衝動，要將真正的福音傳給他們，好救他們中間一些人脫離地獄的火。

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過的，自1800年以來，羅馬天主教確實有過很大的改變，但他們的異端本質卻絲毫沒有改變。那些所說改變，只不過是外觀裝飾上的改變而已，為要藉著「教會大合一運動」來達成詭詐的目的。

今天的「新福音派主義者」確實與往日的「福音派主義者」大大不同。羅馬天主教沒有甚麼改變，只是那些福音派主義者大大改變了。

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

葛培理是二十世紀末葉，福音派的首要人物。奧肯加曾經這樣說：「從天主教『彌撒』的水平來說，葛培理確實是『新福音派主義』思想的發言人。」（摘自 John Ashbrook 的《New Neutralism II》）1992年出版的《今日基督教》雜誌亦曾經有過一篇文章這樣說：「任何描述都不會過份地高估葛培理在過去五十年來對福音派主義的影響。……葛培理擁有如下大部份的特徵：他復甦了福音派主義……也降低了教義的重視程度，又降低了各宗派之間，因為神學思想不同而分裂的程度……。以福音派主義來說，葛培理可說重整了基督徒之間的團契，以至在草根階層中推行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得到昇華——人們開始認為，宗派之間的分歧是不合宜的，而不是有害的。」（摘自1992年10月《今日基督教》的一篇文章《福音派主義可以繼續成功下去麼？》）

奧肯加與《今日基督教》都承認，每當我們看葛培理，我們就看見「新福音派主義」。因為事實上，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合作，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

許多人這樣控告說：那些指摘葛培理為妥協主義者的人，其實是因為他們恨葛培理。我個人反對這樣的控告。我倒要指出，這些人這樣控告我們，是因為他們反對「聖經的分離主義」所致。其實我們並沒有恨葛培理，也沒有人可以指

證我們曾經恨過葛培理。我從小就在一個美南浸信會的家庭中長大，也常愛聽葛培理在無線台和電視台上傳講福音。每當我聽到他那迷人的聲音，我都會感到激動。我常爲他禱告，我問神，爲甚麼一個經常傳福音給這麼多人的傳道者，也會與假師傅妥協，不肯表明自己的立場，與他們疏遠？我的妻子和她的母親之所以信主得救，葛培理的講道實在有過不少供獻。因爲早在六十年代之初，她們在亞拉斯加的電視中，收聽到葛培理的講道，刺激起他們去尋求主。結果她們找到一間小小的浸信會，在那間教會牧師的帶領之下，最後就決志相信耶穌基督。寫到這裡，我站在神面前嚴肅地表示，神知道我並沒有恨葛培理。我只不過對他在真道上妥協，感到心碎而已。我曾經爲他流過許多眼淚，不明白他的所作所爲爲甚麼遠離聖經的教訓。當我看到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樣被出賣，我就無法閉口不言了。親愛的讀者，你們也知道，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一類的事，是非常嚴重的事，所以連保羅也毫不猶豫地起來，當眾指摘彼得不應妥協和裝假，因爲他的行爲表現叫旁觀者感到福音的真實性被弄模糊了。（參加2:11-14）我知道我不是保羅，但神告訴我，我也要爲所交付給我的真道竭力爭辯（猶3節），這就是我說話的動機了。

葛培理在開始他的佈道事工之初，講道時還會反對自由神學信仰、天主教信仰、和共產主義。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種負面的講道內容。取而代之，他採用容忍、中和、並積極的表達方式。這是爲要討好異端，不惜違背聖經真理。聖

經並不是一本只講容忍、中性，和積極內容的書，乃是充滿斥責邪惡和假冒的書。

葛培理何時開始妥協的？

葛培理的妥協和不順從聖經教訓的表現，自他牧會初期就開始了。1918年，他出生於一個長老會的家庭。他表示，於1934年，他因為聽到一位浸信會佈道家夏慕德（Mordecai Ham）的講道而信主。1936年5月，他高中畢業，同年秋天考進伯鍾斯學院（Bob Jones College），這學院後來改名為「伯鍾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但在這間學院裡，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轉到佛羅里達聖經學院去，理由是不喜歡那間學院的紀律太過嚴峻。他在自傳中表示：「佛羅里達聖經學院令我感到最興奮的，就是學生可以在課堂上隨意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那時我已經開始思想，將來有機會我一定將『教會大合一運動』和『福音派思想』混合在一起。」（摘自葛培理所著的《Just As I Am》第46頁）。葛培理說，是在佛羅里達州居住的那段日子裡，感到「蒙召」做傳道的。到1938年底，他受浸加入一間浸信會。1939年初，美南浸信會按立他為傳道人，有資格在講台上向會眾講道。1940年5月，他在佛羅里達聖經學院中畢業。同年9月，他再轉到「惠敦學院」（Wheaton College）進修，直到1943年才畢業。在惠敦學院最後那一年，葛培理已經開始在「西泉浸信會」（Western Springs Baptist Church）做牧養工作，直到畢業後一年為止。1944年5月，他又開始在新成立的「芝加哥基督少年軍」（Chicagoland Youth for Christ）中做傳道人，直到1945年1月，被「國際基督少年軍」（Youth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委任為第一位全時

間國際佈道家爲止。由1947年12月至1952年2月，韋利（W. B. Riley）所創立的「西北學院」（Northwestern Schools）更選舉他爲該學院的主席。這職位使他有機會爲「基督少年軍」出外四處佈道。並且藉此機會，他使自己的事工慢慢地獨立起來。到1950年，「葛培理佈道協會」（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正式成立，電台節目「決擇時刻」（Hour of Decision）也在那一年開始廣播。1947年9月，葛培理首次在大急流市（Grand Rapids）、麥芝根市（Michigan）舉行全城佈道大會。1948年10月，他又在奧古斯達市（Augusta），喬治亞市（Georgia）展開巡迴佈道事工。自此，他就公開而按計劃地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了。這計劃的第一次佈道大會，得到全城教牧同工聯會的贊助。於是，「葛培理佈道協會」就開始向各教會提出更多的要求、讓更廣闊的宗派教會可以支持他。1949年，葛培理在洛杉磯舉行佈道會的時候，他的佈道事工消息開始得到國際性報章的垂注，以頭版新聞來報導他的事工。雖然如此，直至1957年，很多基要派領袖才開始與他決裂。因爲那一年，他公然接受紐約市「基督教自由神學派協進會」（Liberal Protestant Church Council）的贊助。爲紐約市所舉行的全城佈道大會，「葛培理佈道協會」更邀請了120位不信聖經無誤的自由神學成員參加。其中，著名的自由神學主義者，諾曼文森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的妻子應大會的需求，率領婦女們組織祈禱小組、自由神學主義者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也在講台上帶領會眾一同禱告。說到這位馬丁路得金

博士，他在1963年12月30日出版的《國際觀察者雜誌》（National Observer）中表示：「耶穌基督為童貞女所生，這只不過是早期基督徒所編寫的神話故事而已。」1961年1月馬丁路德金又在《黑檀雜誌》（Ebony Magazine）中說：「我不相信地獄是一個有真實永火焚燒的地方。」

其實葛培理的妥協行動，遠在**1957年**之前已經開始了。因為葛培理自己見證，早在**1944年**，他已經跟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天主教領袖善富頓（**Fulton Sheen**）做朋友。所以當善富頓在1979年12月逝世的時候，葛培理作見證說：善富頓是他35年來的好朋友（摘自1979年12月11日的《Religious News Service》）。其實善富頓是一位忠於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天主教徒。他在自己的作品《寶貝在瓦器裏》（Treasure in Clay）中見證說：他的屬靈祕訣就是每週六都守彌撒，為要「尊馬利亞為蒙福之母，藉以求她保護我的祭司職任。」在他的傳記中，他以一整章的篇幅來推崇馬利亞，說：「她是我所敬愛的女人。當我受按立為神父之時，我已經向她立志，今後每一個星期六，我都會向這位蒙福的母親獻上基督的聖體為祭……。所以我可以十分肯定，有一天我死了，我必定會來到基督的審判台前，聽到基督用憐憫的聲音對我說：『善富頓，我母親曾經向我提起你的名字！』因為我一生曾經做過不少次朝聖，例如：我到過『盧達聖母龕』（Our Lady of Lourdes）朝聖約30次，去過『花地馬聖母龕』朝聖約10次。」（摘自善富頓所著的《寶貝在瓦器裏》一書第317頁）

葛培理在其自傳中形容自己第一次與善富頓會面（雖然他沒有說明日期），說：有一次，他由華盛頓坐火車到紐約去。路途上，當他正準備在車廂中小睡的時候，突然善富頓前來敲門，說：「請問可否讓我進來與你談談，和一起禱告呢？」（摘自葛培理所著《Just As I Am》一書，第692頁）葛培理在書中回憶說：「我們談及各人的事工，和各人對福音的共同負擔。我告訴他我非常欣賞他的牧養和對基督的專注……我們談了許久，又一同禱告了許久。最後，當善富頓要離開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好像是我認識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一樣。」這樣，葛培理已經承認，早在第一次與善富頓見面之時，他已經接受了善富頓的「聖禮福音」的觀念。嚴重的問題來了，我們認為葛培理一直在欺騙我們。因為他一面與善富頓會面，跟他結交做佈道同工；另一方面，他又向不少基要派的領袖表示，他怎樣反對天主教，他怎樣委實是一個基要信仰者，和一個與異端分離者。最低限度，他向波鐘斯（Bob Jones）和約翰賴斯（John R. Rice）等人就真實地這樣說過了。現在我們才知道，他骨子裡從未有過任何反對天主教的行動，也從未真實地離開過任何異端。

葛培理是在1944年遇上善富頓的。三年後，他才開始城市巡迴佈道事工。其實1944年，葛培理才在「基督少年軍」開始他的傳道生涯。那時，應該還未有人認識他。為甚麼在那時會有一個像善富頓這樣傑出的天主教領袖，前來跟一個寂寂無名的基

要派浸信會傳道人，葛培理結交呢？那時，葛培理才只不過從高中畢業出來八年而已！

除了善富頓之外，1950年，波士頓大主教理察古盛（Richard Cushing）也對葛培理有過非常的影響。那年一月，古盛爲了支持葛培理的全城佈道運動，故意在自己教區的報章上，寫上一篇首頁文章，大標題稱葛培理爲「卓越的葛培理」。幾十年之後，到1991年，葛培理在接受訪問中回憶這事，表示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事件之一。他說：

「五十年代初，另一件發生在波士頓，又非常值得記念的事，就是大主教古盛在《導航者》雜誌的封面上，印上「卓越的葛培理」的字樣。結果，這消息傳遍全國各地。之後，我與他成爲非常親密的好朋友。那時，我第一次認真地這樣想，怎樣處理整個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問題？我開始注意到，世界各地都有許多基督徒，不論他們被人稱爲新神學派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甚麼名稱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他們都是屬基督的。」

（摘自1991年11月書室期刊《葛培理受訪問》）

到1950年尾，葛培理開始調動同工，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工作小組，專責爲他安排一切佈道大會的事務。韋利希麥家（Willis Haymaker）就是其

中一位前線工作人員，專門到各城鎮去，為佈道團預備好所需的一切，好讓葛培理前來講道。所說的預備工作，其中一項是：「**向當地天主教的主教或神父推介佈道團的大計**，邀請他們出席佈道大會。又在所有出席的神父之中，委任一位專門負責寫報告。因此，早在第二次梵蒂岡會議還未向基督教採取開放態度之前，葛培理佈道團已經常常這樣做了。**但我們最關注的，就是要主教們明白，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人們離開天主教。**反之，我們要影響他們對基督更委身。」（摘自葛培理著《Just As I Am》一書第163頁）

葛培理又在1997年寫的自傳中承認，早在佈道團之初，他已經開始接近羅馬天主教了。他說：

「當時（1950年3月），新英倫省內基督教各大宗派教會還是很軟弱，部份原因是各宗派的神學思想都很分歧，唯一神論的思想影響著許多教會，羅馬天主教的勢力也很強。雖然如此，仍有好幾位羅馬天主教神父，和屬於唯一神論教派的神職人員，並住在他們教區內的一些熱心信徒，願意前來參加我們的佈道大會，與福音派各教會的代表們一起事奉。我的福音派背景其實很有限，因此這些不同宗派的人前來彼此合作，大大擴闊了我對教會合一運動的觀念。我開始與各種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並對他們的牧

者產生一種屬靈的愛。」

（摘自葛培理著《Just As I Am》一書第167頁）

我要提醒讀者，葛培理在上文所說，他要學習去愛的那些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屬於天主教、唯一神論派、和新神學派的神職人員，其實這些教派都是反對葛培理的信仰的。例如：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否定基督教的救贖論，認為單靠相信神的憐憫，而不靠聖禮或功德，是不可能的。他們更否定聖經是信心和行為的唯一最高權威。另一方面，新神學派神職人員卻否定神的話語絕對無誤。他們質疑，甚至公開否定，基督是由童貞女所生。又認為神蹟、贖罪觀念、和耶穌基督復活等觀念，都是無稽之談。至於唯一神論教派的神職人員，他們否定耶穌基督的神性，和血的救贖。他們更藐視聖經無誤的真理。這樣，讀者可以看見，這些人都是不信的，為何葛培理偏偏要去愛他們，卻不肯去愛那些落在危難中，和被邪惡的假師父所欺騙的人？為何不愛神的話語，使他能以在敵人面前站立得穩？為何不愛聖經中的基督，使他知道應該拒絕那些拒絕基督的人？葛培理的愛在方向上錯誤了。他愛上一些領導羊群走錯路的牧人，卻不可憐那些被這些牧人引導錯誤，以致離開了基督，步向永遠滅亡的羊。

顯然，善富頓和理察古盛這一類天主教假師傅，已經深深地影響著葛培理這位年輕佈道家。不但如此，葛培理也深深地受新神學派的神學思想影響。就以葛培理在1954年2月，在「聯合神學

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課堂上所講的爲例，當時他指出：自己曾經在1953年與謝西貝達(Jesse Bader)，和約翰博奈爾(John Sutherland Bonnel) 有過一次整天的閉門會議。因爲是閉門會議，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當時葛培理受這兩個人影響的程度。但三十年之後，葛培理自己公開向「宗教新聞服務」承認，貝達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很親密的顧問之一(摘自1986年3月31日的《基督徒新聞》)。這使我們回想，那次葛培理與貝達舉行的閉門會議，實在是將自己和魔鬼一同反鎖在房間內。因爲我們深知道，謝西貝達和約翰博奈爾這兩個人，實在是魔鬼差來的使者(參林後11:13-15)。貝達和博奈爾皆被列爲「自由神學主義者」，他們否定很多新約聖經的教訓。貝達曾任「國家教會協進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秘書一職，而「國家教會協進會」就是美國新神學派的總部，是許多邪惡信仰的根源。博奈爾更在1954年3月23日出版的《觀望雜誌》(Look magazine) 中，指出他自己和很多長老會的牧師，都不相信童貞女生產耶穌的觀念、復活的觀念、神默示聖經的觀念、天堂和地獄永火等觀念。

葛培理應該明白，神會在聖經中警告過每一個人，要注意和防備那些言論與聖經信仰相違背的人(羅16:17)。聖經指出，這些人的話「如同毒瘡」(提後2:16-18)，又像「麵酵」(加5:9)，與他們「濫交是敗壞善行」的(林前15:33)，但葛培理全不理會這些警告。

到1950年，葛培理已經跌倒到一個地步，甚

至在病榻中，也盼望得到天主教神父的慰藉。因為1950年，葛培理在新英倫舉行佈道大會之時，他在康迺迪克洲的哈特福市病倒了。他將行政祕書卓露卑雲（Gerald Beaven）請來，「在他床邊，為他誦讀善富頓所著的《靈裡的平安》（Peace of Soul）一書。」（摘自Wilson Ewin所著的《The Assimilation of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into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我們已經為讀者指出，善富頓對馬利亞極其敬愛，並且他認為，只有向馬利亞禱告靈修，才能得到神的憐憫。這樣，葛培理這個年輕的基要派佈道家，為何還要在善富頓的作品中尋求慰藉呢？

早在1948年，葛培理開始他的城市巡迴佈道事工。兩年後，即1950年，已經有不少傳言批評他與天主教合作了。

1950年，浸信會聯合大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Regular Baptist Churches）的羅拔傑金博士（Dr. Robert Ketcham）偶然間從報章上看到一則文章，指出葛培理表示希望能在俄利根州的佈道大會上，與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合作。另一則新聞則報導，葛培理將佈道大會的決志卡，交與羅馬天主教教會處理。傑金博士馬上發信向葛培理詢問，到底有沒有這回事。結果，葛培理的行政祕書謝利卑雲（Jerry Beaven）回信時，強烈譴責傑金博士。以下是謝利卑雲回信中的一段：

「...例如，你問及葛培理有沒有邀請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在佈道大會上與他合作。雖然你說，這是記者從葛培理那裏直接得聽到的，但對我來說，這種意念還是極其荒謬的。連你自己也應該知道，這種消息是絕對不準確的.....。再者，你又表示，葛培理竟然會將佈道會的決志卡交與羅馬天主教教會跟進，我認為，這更是難以想像的。」

（摘自 John Ashbrook 所著的《New Neutralism II》）

可是，才不久之後，葛培理就公開地做出，他的秘書所認為非常「荒謬」和「難以想像」的事了。因為就在1952年9月6日，記者威廉．麥艾雲（William McElwain）為匹茲堡（Pittsburgh）的《星期日電報》（Sun-Telegraph）寫了一篇報導文章，形容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來往是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

「葛培理強調他在匹茲堡舉行的佈道大會，是屬於超宗派的。他又表示，希望明天在聖保祿大教堂中，能聽到善富頓（Fulton J. Sheen）主教主持彌撒的講道。葛培理說：『我知道，在我們的佈道大會中，有許多決志信主者被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而天主教教會的刊物也有許多報導，表示對我們的佈道大會重新感到興趣。波士頓和

華盛頓兩個城的情況都是這樣。其實，我們推動佈道大會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幫助同區的所有教會能合而為一。』

由此可見，傑金博士之前所說的問題，並不是荒謬的。早在1950代，葛培理已經公開承認，他一直將慕道者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1986年，當這位已經有67歲高齡的葛培理再一次接受《宗教新聞服務社》訪問，他表示，他的佈道事工在最早期就已經有意地，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參《Christian News》1986年3月31日）。

之後，葛培理更積極地與羅馬天主教，和新神學派拉近關係。正如《新福音主義之二：揭發妥協與灰色地帶》一書的作者約翰賴舒本（John Ashbrook）所說：「妥協主義會使一個人做出自己本來不想做的事。」聖經也警告我們說：「濫交是敗壞善行的。」（林前1:15, 33）

到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所帶來的關係怎樣影響著葛培理呢？1978年1月份的《麥柯雜誌》（McCall's magazine）刊載了一篇由雅各米高邊（James Michael Bean）訪問葛培理的報導。葛培理承認他的思想有了改變，說：

「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期更能接納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我與天主教、信義宗、和其他與美南浸信會頗為不同的宗派領袖接觸，我希望帶動他們一同朝一個正確的方向

走。舉例來說，我發現我的信仰，基本上與羅馬天主教所相信的沒有甚麼不同。他們相信基督由童貞女所生，我也相信；他們相信耶穌基督復活，和再來審判，我也相信。我們之間如果有所不同，也只不過是教會後期傳統的問題而已。」

這是謬論。羅馬天主教的錯謬豈是僅僅屬於「後期教會傳統的問題」這麼簡單？羅馬天主教教義完全與福音，和新約教會背道而馳，因為她並將聖經真理與異教信仰、和猶太教信仰，混合起來。羅馬天主教所相信的，藉聖禮和功德帶給人恩典的福音，是必須受咒詛的（加1:6-10）。但葛培理卻長期以來視羅馬天主教教義為正確的基督教信仰，絆倒無數人，使他們走錯路。

葛培理被警告過多次

有些讀者問我，看到葛培理這樣離開聖經真理，有沒有親自警告過他？我的回答是「沒有」。因為我沒有途徑可以這樣做。所有給與葛培理的私人信件，都被他的龐大組織過濾過。我無法與他對話。不過，我以爲無須由我親自去警告他，因為過往已經有過不少有機會與他接觸的人，對他作出過許多次的警告。所以，不能說沒有人警告過他。例如，在葛培理與天主教等教派接觸之初，就有如下幾位著名的基督教領袖重複地警告過他：博鐘斯（Bob Jones）、約翰賴斯（Sr. John R. Rice）、羅拔蘇拿（Robert Shuler）、雅卓威格（G.Archer Weniger）、占士班納（James Bennet）、卡爾麥堅泰（Carl McIntire）、拜斯奧斯堡格（Bryce Augsburger）、查利胡比治（Charles Woodbridge）及羅拔卡含（Robert Kelcham）等。

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的，就是早在葛培理出來傳道之初，人們已經公認他是一個基要派信仰的傳道人。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指出的，他曾經就讀過基要派信仰的博鐘斯學院（Bob Jones College），又自認是博鐘斯博士（Dr. Bob Jones, Sr.）的一個傳道入室弟子。葛培理的助手傑夫巴路斯（Cliff Barrows）也是從博鐘斯學院畢業出來的。1951年12月，葛培理在他所主播的電台節目「抉擇時刻」（Hour of Decision）中，訪問小博鐘斯博士（Dr. Bob Jones Jr.,）的時候，還以如下的話作爲總結，說：

「在這世風日下，人們越來越注重物質主義的生活中，能見到一所如此偉大、特別為耶穌基督的福音，持守堅定立場而設立的大學，實在令人感到興奮。不但今天我們極需要維持美國人的舊風氣，我們更需要的，是訓練一些有耶穌基督福音立場的男女，把他們送進社會裡，影響社會。」

（葛培理的電台廣播，博鐘斯大學，1951年12月）

這位可以稱為「兩面人」的葛培理，在博鐘斯博士面前講出這段話之時，同一時間，又與自己所說的話背道而馳。那時，葛培理已經加入約翰賴斯（Dr. John R. Rice）所主持的《上主之劍雜誌》（The Sword of the Lord）的協商籌委會；又從1947年至1952年，出任「西北學校」（Northwest Schools）的主席（這是由著名的基要派領袖William Bell Riley所創立的）；同時也是該校出版的基要派刊物《導航者》的編輯。而這份刊物的版頭設計，很勇敢地標榜著：這是一份「與任何形式的新神學主義採取對抗立場的刊物」。在早期，葛培理還得到「西北學校」和「博鐘斯大學」所頒發給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但是，請看一看以下這些人，怎樣親自懇請他離開不合聖經教訓的方向：

占士班納（James Bennet）原是紐約一位著名的律師，和聖經教師。葛培理從「惠頓」（Wheaton）畢業出來之後，占士就認識他了。他鼓勵葛培理開始他的佈道事工，但是當葛培理公然

與天主教和新神學派人士來往之時，占士就盡一切努力去勸他擺脫這樣的錯謬。1954年，紐約佈道大會還未舉行之前，占士就約見葛培理，懇請他不要再推動他的「教會大合一運動」計劃。葛培理不肯接受占士出於聖經的勸告，於是占士就辭去葛培理佈道大會委員的職任，並且寫了一封公開信，警告眾人不要支持葛培理所走的方向。（參James E.Bennet所著《The Billy Graham New York Crusade: Why I Cannot Support It》. A Ministry of Disobedience. Collingswood, NJ: Christian Beacon Press, May-September 1957）。

這樣，占士班納已經警告過葛培理了。

約翰賴斯博士（Dr. John R. Rice），是基要派浸信會出版一份頗有影響力的《上主之劍》的總編輯，也在最早期支持過葛培理。事實上，葛培理也是《上主之劍》的協商委員之一。賴斯博士原是一個溫文可親的基督徒，他懇切地請求當時還是很年青的葛培理，不要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這種錯謬的方向。維奧娜華頓小姐（Viola Walden）就是最好的見證人。她做了賴斯博士四十六年的秘書，一向忠心耿耿。她為賴斯寫傳記。在傳記中，維奧娜華頓見證賴斯博士曾對葛培理愛護有嘉，後來也是因為一再勸勉葛培理要離開「教會大合一運動」不成功，而與葛培理分開的（參《Walden, John R. Rice, pp164-167》）。在書中，她特別指出，早在1955年，葛培理在蘇格蘭與賴斯會面。葛培理對這年長的佈道家還這樣作出保證說：

「我曾向神許下諾言，我絕對不會容讓我的委員，或任何一個佈道團的工作者，主動地與那些不相信主耶穌由童女所生、不相信主耶穌寶血救贖功效、不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人一起工作的。這些人永遠不可能會成為我的佈道團的成員。這是我對神許下的承諾。」

（參1966年2月15日朗奴偉密臣牧師〔Pastor Roland Rasmussen〕在博鐘斯大學禮堂中講道的訊息：《為甚麼我不能支持葛培理》。）

很明顯，葛培理並沒有履行他對神所許下的承諾，反而變本加厲地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所以賴斯博士再次與他會面，勸勉他無論如何也要順服聖經的教訓。兩年後，賴斯博士在他的一篇文章裡，引述當時與葛培理交談的情況，說：「我應葛培理的邀請，到他在北加羅連納州滿地可的家中，去與他交通。當時，我們為這事認真地交談...。」（參John Rice所著《上主之劍》，June 20, 1958）

葛培理當然不肯聽。於是賴斯被逼於1957年公開宣佈，他和他所主持的《上主之劍》，與這位年青的佈道家分開。維奧娜還這樣見證，說：「若說賴斯博士用一種苛刻的態度來對待葛培理，那就與事實太不相符了。因為即使他譴責葛培理與天主教妥協，過了很久之後，他還是常常為葛培理禱告，也為許多在葛培理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的人快樂。」（參《Walden》一書，pp 166-167）

這樣，約翰賴斯已經懇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

博鐘斯博士（ Dr. Bob Jones Sr. ），這位年長的佈道家第一次遇上葛培理的時候，是應北加羅連納州，查洛迪鎮（ Charlotte ）一間教會的邀請，前來主領佈道會。那時，葛培理還在讀中學。他父親法蘭克（ Frank ），因為深受博鐘斯博士的感染，向博鐘斯博士表示，盼望自己的兒子葛培理，能有機會就讀位於塔里斯（ Tennessee ）的「博鐘斯學院」（這間學院後來在1946年遷至南加羅連納州的格連威〔 Greenville 〕，然後改名為「博鐘斯大學」）。結果，1936年葛培理中學畢業，他就真的被錄取進入「博鐘斯大學」。但是後來他感到這間大學實在太嚴，無法適應，於是不久之後又轉到「佛羅里達聖經學院」（ Florida Bible Institute ）。之後，於1940年再轉到「惠敦大學」（ Wheaton ），終於在這裡畢業，取得人類學學位。博鐘斯博士很早就開始支持葛培理，甚至葛培理也曾寫過一封信給博鐘斯博士，表示自己在「博鐘斯學院」讀書的時候，就有佈道的負擔，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博鐘斯的入室傳道弟子」（參 Bob Jones, Sr., 於 March 6, 1957 著的《letter to a supporter》）。當葛培理開始與一些假師父混在一起的時候，博鐘斯也曾寫信譴責過他的所作所為。最初，葛培理的回覆是說，他並沒有與新神學派人士，和天主教人士一起工作的意圖。1952年6月3日，他又告訴博鐘斯博士，說：「那些新神學派分子並沒有在任何一方面支持我們。」但是不久之後，葛培理卻公然做出他自己

曾經多次否認的事來。因為他在1957年舉辦的紐約佈道大會中，竟然邀請了一百二十多位新神學派人士加入佈道團委員會！

這樣，博鐘斯博士已經懇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

查理胡比治博士（ Dr. Charles Woodbridge ）又是另一位曾經嘗試過糾正葛培理的著名基督教領袖。胡比治博士是「富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一位教授，也是較早時「全國福音派聯會」（ Nation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的一名成員，直到後來「福音派聯會」接受「新福音派主義」（ New Evangelicalism ），他才離開。胡比治博士是一位受過高深教育的長老會牧者：從「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取得碩士學位、又從「杜克大學」（ Duke ）取得哲學博士學位。而且他曾到德國「柏林大學」（ Belin University ），和「馬爾堡大學」（ Marburg University ），和巴黎的「索邦尼大學」（ Sorbonne ）等高等學府進修。他在他的經典作《新福音派主義》（ The New Evangelicalism ）一書中，提及葛培理曾經在1958年到過他的家來訪問：

「1958年，葛培理博士來到加州的亞特蘭大，在我的住所中與我談論這些事。我們傾談了兩小時，我把羅馬書16章17節指給他看。盡力勸他離開那些不信的假師傅，

不要讓他們進入他的佈道團。可是，最後我還是無功而退。」

(參Woodbridge所著《The New Evangelicalism》
1970, p.44)

這樣，查理胡比治博士又已經懇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

杰克華生（ Jack Wyrzten ），他是《生命之道》（ Word of Life ）雜誌的創辦人。他也曾警告過葛培理。以下引證的話，是一位牧師在一個聚會中，親眼目睹一些基要派領袖想要挽救葛培理的見證：

「1957年，我參加一個聚會，親眼看見杰克華生和胡比治博士面對面與葛培理談論關於他向異端妥協，和他漸漸遠離「基要派信仰」的事。當時葛培理住在靠近紐約斯干湖（ Schroon Lake ）的《生命之道旅店》，參加一個為期兩天的聚會。那一年的秋天，將要舉行「全紐約葛培理大佈道」。但在那一次與葛培理會面之後，杰克華生和胡比治博士都停止一切對葛培理的支持，不再與他有任何交往。杰克華生博士也將他與葛培理絕交的原因告訴《生命之道》的同工們。當時我還是一個非常幼嫩的基督徒。我是在19歲那一年，即1956年6月24日，因為閱讀《生命之道》而信

主得救的。翌年，胡比治博士也像杰克華生博士一樣，宣佈為同樣理由而與葛培理絕交。」

(E-mail dated Feb. 27, 1999, from Pastor Bob Welch, D. Min, Collegiate Baptist Church, Anchorage, Alaska)

這樣，杰克華生已經關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可惜，後來杰克華生也受到影響，他自己也走「教會大合一運動」的路向。）

羅拔卡含博士（Robert Ketcham），是「浸信會聯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Regular Baptist Churches）1950年的領導人。當他看到一些新聞，報導葛培理與猶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事奉，並且還將佈道大會的決志卡轉介到一些天主教教區去，他就馬上寫信給葛培理，查問這些新聞報導是否屬實。葛培理的執行秘書謝利卑雲（Jerry Beaven）這樣回答說：

「……例如，你問及葛培理有沒有邀請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在他的佈道大會上與他合作。雖然你說，這是記者從葛培理那裏直接得聽到的，但對我來說，這種意念還是極其荒謬的。連你自己也應該知道，這種消息是絕對不準確的……。再者，你又表示，葛培理竟然會將佈道會的決志卡交與羅馬天主教教會跟進，我認為，這更是難以想像的。」

（摘自John Ashbrook的《New Neutralism II》）

不久，謝利卑雲的話就被證實是一個謊言。葛培理是有意與新神學派，天主教，並猶太教的領袖們一起合作的。他將決志卡轉介到天主教會去，也是故意的。我要指出的是，雖然羅拔卡含博士直接勸告葛培理，葛培理還是不聽勸。

這樣，羅拔卡含亦已經關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

偉信依榮（Wilson Ewin），又是另一位警告過葛培理的已故基督教領袖。他在羅馬天主教所管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裡，長期宣教。所以葛培理不能推說，依榮毫不理解羅馬天主教教義，或天主教的福音教義。和葛培理不同的，是葛培理周遊各地，在組織得井井有條的佈道大會中講道，之後，就返回自己的旅店套房，與外間隔絕；依榮卻以一個牧師身份，長年累月地與那些羅馬天主教徒同住、同工。他在自己所寫的《你也可以領羅馬天主教徒歸主》書中，表示這書是獻給「我所親愛的羅馬天主教徒，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為他們死，為他們流出寶血，為使他們得著救恩的。」他指出：

「二十年來，我一直留意葛培理佈道團，和他的佈道事工。事實上，我和路得（依榮之妻）也曾參加過葛培理佈道大會的詩班，為他們做陪談員。我們收過很多寄給葛培理的信件，表示對他與羅馬天主教混在一起，感到非常關注。我甚至跑到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

葛培理的佈道團總部去，提醒他們不應該與羅馬天主教過份妥協。我們認為，葛培理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實在將真理拋到街上去了。」

（Wilson Ewin的《代禱通訊》，推介他所著的《佈道家葛培理被羅馬天主教同化》1993年1月）

這樣，我們看過衛信依榮也曾誠懇地警告過葛培理了。

以上所引述的這些人物，其實只不過是眾多譴責過葛培理的人之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對於這些人的警告，葛培理也有在他的自傳中提及：

「最使我痛心的，是來自一些基要派領袖們的反對。他們之中，大部份都是我所熟識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全然認同，但我仍然極之羨慕和敬重他們，欣賞他們對基督如此委身。他們當中，有多位曾經在我們佈道事工的早期，全力支持過我們的。他們的批評，雖然使我感到極度傷痛，但我又怎能把他們的評論，看為一般反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人的評論，而將他們拒諸門外呢？」

（參葛培理所著《Just As I Am》p.302）

葛培理在自傳中繼續形容這些批評為「太過份」，他又認為那些批評他的人，證明是「沒有愛心」的。可是，我們知道，無論別人的指責是怎樣溫柔，和怎樣有愛心，不肯順服的人總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們總會將別人的勸戒形容為逼迫，這是人性的自然反應，為要放出煙幕來遮掩事實的真相。其實接受別人的譴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別人提出譴責，也同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在不肯接受的一方看來，任何譴責都是沒有愛心的。再者，面對別人的譴責，一般人通常的反應，總是拼命找對方的過失，好證明不但自己是罪人，其實人人都是罪人。箴言教導我們：人怎樣回應聖經的責備，也怎樣暴露自己內心的實況：

**「謹守訓誨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路。」
（箴10:17）**

**「棄絕管教的，輕看自己的生命；
聽從責備的，卻得智慧。」
（箴15:32）**

葛培理沒有一個良好的態度來回應聖經的責備。他明明知道自己錯了，也不肯回轉過來。反而詆毀那些憑愛心和神的話語勸戒他的人。

許多人都警告過葛培理了。他有過太多的機會悔改了。可惜，他頑梗不肯回頭，不順服神的話語，也不肯與不信的人疏遠。

逐年觀察 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關係的進展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的愛情故事，是怎樣發展的。我們可以說，這個世代中，再沒有一個人像葛培理這樣，需要為拆毀隔開真理與謬誤之間的圍牆，而負起責任。以下的資料，是取材於我們所編著的《福音派與羅馬天主教》一書，這本書十分詳盡地報導，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教會之間的關係。

1950年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打從1950年開始，葛培理已經墮落於天主教的教義中，不能自拔。甚至當他患病時，也要藉著天主教的教義來自慰。因為1950年，葛培理在新英倫省舉行佈道大會的時候，他在康迺迪克（Connecticut）的哈特福（Hartford）病倒了，臥在病床上有數天之久。他的行政秘書卓露卑雲（Gerald Beavan）「在他床邊陪伴他，拿來一本善富頓主教（Fulton Sheen）所著的《靈裡的平安》讀給他聽。」（參Wilson Ewin所著的《佈道家葛培理被天主教所同化》）。我們經已指出，葛培理在五年前曾經與善富頓主教會過面。善富頓主教最愛慕馬利亞，他認為先向馬利亞禱告靈修，才能得到神的憐憫。自1950年開始，波士頓的大主教理察古盛（Richard Cushing）同樣對葛培理有很大的影響。因為1950年1月，當葛培理舉行佈道大會的時候，

高遜在他教區報章的頭版篇幅上，印上「葛培理，很棒！」（Bravo Billy）的大字標題。我們又曾經指出，1991年，葛培理在一次被訪問中，引述那一次事件為一生之中，最難忘的回憶。

1952年

我們又曾經指出，1952年9月6日，記者威廉麥艾雲（William McElwain）為匹茲堡太陽電報公司（Sun-Telegraph）撰寫了一篇文章，提及葛培理將決志信主者，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

1955年

1955年12月29日，葛培理在他下榻的酒店套房中，與占士班納（James Bennet）和杰克華生（Jack Wyrzten）會面。（他們二人力勸葛培理不要再為「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與天主教妥協。）後來葛培理卻公認，他實在有意將決志者轉介到羅馬天主教教會去。

1956年

1956年9月17日，在紐約海軍官方酒店（Hotel Commodore）舉行，有一千一百多人出席的一個餐會上，葛培理被邀為名譽嘉賓，和主要講員。他在餐會中明確地表示，他期望猶太教徒、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前來參加他的佈道大會，但會後決志信主的人可以返回自己的教會。這段話，還有1956年9月18日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Journal）加以證實，茲引述如下：

「葛培理說：『然後，我們會將他們送返原來的教會，不論是羅馬天主教、基督教、或猶太教，各歸自

己的教會。』（葛培理，《Church League of America》）」

那份1956年9月29日出版的《基督徒教會生活》（Protestant Church Life），也同樣證實這樣的報導。

1957年

1957年5月6日出版的《新聞一周》又報導葛培理有如下的表示：「我在天主教的神父中，有許多朋友……。天主教教會對我們經常都是十分友善和寬容，正如他們教會的法典容許他們參加我們的佈道大會一樣。」

1957年9月21日，葛培理佈道團的成員華特史密夫（Walter Smyth）被《三藩市新聞》（San Francisco News）訪問的時候，當眾承認，佈道團確實有將三藩市佈道會中的決志者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的事。他說：「即使決志者不是新教徒，他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去的教會。」後來，華特史密夫否認自己曾說過上述的話，有關的報章只能暫時擱置這段新聞，沒有立即發表。可是，等到葛培理抵達該城的時候，記者直接問他，決志者是否會被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他就清楚地答覆，說：「在我們的佈道大會中，所有決志者都分別轉介到他們同區的地方教會去，可能是基督教，可能是天主教，也有可能是猶太教。」

占士班納（James E. Bennet）是紐約一位著名

的辯護律師，和聖經教師。當他看見葛培理與新神學派，和其他假師傅一起事奉的時候，他立即辭去紐約葛培理佈道團委員會的一切職務。他爲1957年那一次紐約葛培理佈道大會寫了一份簡述報告書，取名爲《最後分析---這是一個不肯順服神的事工》。在報告書中，班納報導如下一段十分有趣的資訊：

「再者，我還有一位朋友（長島一間教會的牧師），裝作一位詢問者，跑進詢問處的房間，向陪談員詢問。陪談員問他來自甚麼教會，他說：『要得救，是否一定需要有一間教會？』陪談員回答說：『對了，你一定要有一間教會。』『我可以加入天主教教會嗎？』『當然可以，如果你有這樣要求的話。』陪談員這樣回答說。然後，陪談員將他那一區的天主教教堂名單交給他。兩日之後，該區一位天主教神父打電話給他，表示：收到他的決志卡，並且想要約見他。盼望他將來會成爲那教會的會友。像這樣的例子，我個人也注意到很多。可以說，這些都是葛培理佈道團裡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相信在眾教會之中，造成無法估計的敗壞。無可置疑的，這麼多年來，已經有數以千計的決志者，被轉介到羅馬天主教教會、猶太教教會、新神學派教會、自由神學教會、和各式各樣的不信教會去。

（參G.Archer Weniger寫給Mr. Walter Smyth的信件。葛培理福音協會，1957年12月20日）。

1960年

1960年10月的《新聞一周》雜誌有這樣的報導，指出：葛培理承認，他絕對不會領天主教徒脫離自己的教會。他說：「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人是沒有任何教會的。我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他們接受基督，這樣無論他們以為自己是天主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都沒有妨礙到他們接受基督。」（《新聞一周》，1960年10月17日）。

1961年

聖經警告我們說：「濫交是敗壞善行。」（林前15：33）這樣，葛培理經年累月地與異教拉上越來越緊密的關係，他對教義的辨別力必定遭到敗壞無疑。1961年，葛培理接受自由神學派美國信義宗教會所主辦的《信義會標準報》（Lutheran Standard）訪問時，表示他所有的兒女，除了最年輕的一個之外，都受過嬰兒洗禮。（葛培理原是在長老會中長大的，後來他出來佈道的時候，轉而加入美南浸信會。但他的妻子路得，就仍然保留在長老會裡）。之後，葛培理作出如下叫人吃驚的聲明：

「對於我來說，要接受這種無法分辨是否得救的嬰兒洗禮，全不考慮他們父母有沒有足夠的決心去履行他們向神所許下的諾言，我感到有

點困難。但我相信，在這樣的嬰兒洗禮中，會有一些神奇的事發生。特別是在嬰孩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的情況下，他們會從小就教導孩子明白基督的真理。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明白這種神蹟是如何發生的，但我相信，總有一種神蹟會發生在這些孩子的身上，叫他們因此重生得救。我的意思是，他們會因著嬰兒洗禮而成為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喜歡稱這樣的重生為「洗禮的重生」，我也認為可以接受。」

（葛培理，與Wilfred Bockelman面談的記錄。Bockelman是《信義宗標準報》的副編輯，美國信義會，《信義宗標準報》，1961年10月10日）。

1962年

葛培理也在拉丁美洲舉行佈道大會。他藉這機會邀請天主教的領袖們參加，並且大事鼓吹「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

葛培理說：「...這一次我們南下旅行佈道。沿途中，無論何時，一有機會我們就與當地的天主教領袖接觸，有時甚至叫那些招待我們的人也感到吃驚。因為我們佈道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我們並不是要針對天主教的信仰，也不會將本來屬於天主教，又在天主教裡認識基督的信徒拉過來，成為基督教的信徒。」

（參葛培理所著的《Just As I Am》p357）

1962年葛培理在巴西舉行佈道大會。巴西的一位主教沙奧保盧（Sao Paulo），站在大會的講台上，葛培理旁邊，為那些上前來決志信主的人祝福。葛培理認為，這一點證明「在整個基督的國度裡，正在發生一件非常龐大、屬於醒覺性和革命性的事。」（參《每日新聞》，International Falls, Minnesota, 1963年10月29日。這段話也被《紐約時報》括引為1963年11月9日的新聞消息。）

原來，為葛培理到南美洲去佈道而鋪路的人，是根史積遜（Ken Strachan）。他父親是拉丁美洲佈道團（Latin America Mission）的創辦人。史積遜也是一位熱心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支持者，與葛培理的觀點相同。葛培理認為：「無論如何，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總需要在某種形式或途徑上聯合起來。」（參葛培理所著的《Just As I Am》p357）。

1962年，葛培理的佈道協會又重新為《海利聖經註釋》（Halley Bible Commentary）進行改編。這本註釋又名《袖珍聖經手冊》（Pocket Bible Handbook）。但葛培理在重新修訂這本書之中，故意將關於羅馬天主教在歷史上殺人最多，最殘酷的「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的部份刪去。（參Wilson Ewin所著的《Today's Evangelicals Embracing the World's Deadliest Cult》，p.57）。其實葛培理的佈道協會雖然取得該書的出版權，卻沒有該書的刪改權。南卡羅來納州，高賓城（Cowpens）的占美羅便士牧師（Pastor Jimmy

Robbins) 告訴我，亨利海利 (Henry Halley) 的遺孀知道葛培理佈道協會將她丈夫的著作刪改，將676至705頁所記錄的歷史事實刪除，感到非常不滿。因為這幾十頁的內容，是記述數以千萬計，死於天主教「異端裁判所」殉道者的歷史。

1963年

1963年，羅馬教皇約翰廿三世 (Pope John XXIII) 去世的時候，葛培理在德國波恩 (Bonn) 又作出以下驚人的評論，說：「我非常欽佩教皇約翰，我認為他為這個世界帶來一個新紀元。我盼望紅衣主教團能夠選出一位新教皇，跟隨教皇約翰所走的路線去行就好了。如果新任教皇走的路線與已故教皇約翰的相反，重新豎立隔離圍牆的話，那將會是一個大悲劇。」(參《Michigan City News-Dispatch》，1963年6月2日)

同年，葛培理在「柏克喜來登酒店」(Park Sheraton Hotel) 早餐會中講道。這個早餐會是為了支持他的「紐約世界博覽會臨時大帳篷」(New York World's Fair pavilion) 而舉行的。10月25日《紐約時報》報導他在那一次早餐會的講道內容，談及如何加強基督徒與羅馬天主教徒之間的合作，說：如果教皇保祿要求他出來講福音的話，他會樂於答應。(參Wilson Ewin所著的《Evangelism: Trojan Horse of the 1990》) 葛培理這番話帶來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從今以後，人們不知道那一種是假福音，那一種是真福音了。教皇保祿並沒有傳講基督恩典的真福音。他所傳講的乃是羅馬天主教藉著聖禮帶來，半恩典半功德

的福音。這樣，我們就要問，是不是如果教皇要求，葛培理就會將真福音傳給他們呢？在這樣的環境下，葛培理所傳的福音，是教皇保祿的福音，還是聖經中的福音呢？葛培理訛稱，兩種福音都是相同的；我們就認為，這種觀念就是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的假福音，其中隱藏著極大的謬誤和邪惡。

又同年，葛培理第一次被一個羅馬天主教機構邀請去講道。這個機構就是「包曼修道院大學」（Belmont Abbey College）。四年後，這間大學頒發一個榮譽學位給葛培理（參《The Gastonia Gazette》，1967年11月22日）。原來邀請葛培理去講道的那位神父，名叫卡夫拔亞倫神父（Cuthbert Allen）。他是那間大學的副行政院長。他留意到那一年，葛培理已經被許多其他天主教大學請去講道。1963年10月25日《紐約時報》也報導，葛培理又公開承認，已經有五個天主教團體請他講道。因此，卡夫拔亞倫神父給葛培理下一個十分有趣的評語，說：

「我一直跟進葛培理的行徑，我必須強調，他越來越天主教化，甚至比他在其他方面的進展更甚。我這樣說，並不是吹捧他，乃是因為這是事實…。我可以說，他能將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很健康地拉在一起，共同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葛培理所傳的，只不過是道德性的、和福音性的神學思想。這是天主教徒可以放心接受的。」

（摘自1965年5月19日，加夫拔亞倫寫給Mr. Julius C. Taylor的信。這封信也刊載於1984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Christian News》上。）

1964年

1964年，葛培理曾經與波士頓大主教，理察古盛（Richard Cardinal Cushing）有過四十五分鐘的會談。事後，古盛表示全面支持葛培理的佈道團。1964年10月8日，克利夫蘭（Cleveland）的《Plain Dealer》雜誌報導古盛的話，說：

「我百份之百支持這位佈道家。我從來未見過一個佈道運動比葛培理博士的更有效。我亦從未聽過他曾經利用過天主教的資料來批評天主教，就是一點點也沒有。」

葛培理聽了，作出如下的回應，說：「我感到，與羅馬天主教的傳統拉得更近了。最低限度，比與基督教內較為思想開放的新神學派拉得更近。」（參John Ashbrook著的《New Neutralism II》）。這樣的話，其實已經成了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慣用語，變得毫無意義。請問，覺得與羅馬天主教的傳統拉近，甚至比與新神學派拉得更近，有甚麼意思呢？兩者豈不都是與聖經背道而馳嗎？在我們來說，兩者都是應該拒絕的，絕對不能任擇其一。因為聖經教導我們，凡是以神的話語為信仰根基的人，都要離開各種不義。（詩119:128, 提前1:3）。

葛培理的佈道團，和與他合作的三藩市眾教會，委任查理士花拉博士（Dr. Charles Farrah）負責跟進佈道大會的決志者，並請他作出統計，向佈道團回報。結果，他在12月16日作出了報告。根據《屋崙報》引述這個報告，說：大約**1,300名**天主教徒到台前來表示決志，結果全部都保留在天主教教會內。他們繼續向聖母馬利亞禱告、守彌撒、向神父告解。（《屋崙報》，1958年12月17日，星期三。由G.Archer Weniger引述，寫成《The Blu-Print》報告書）。怪不得，天主教教會一直支持葛培理的佈道大會。

1966年

1966年7月，葛培理又在英國倫敦舉行佈道大會。在離開倫敦之前，葛培理與羅馬教廷差來，帶有使徒身份的代表會面。（參刊於《紐約時報》的「Graham interview with Edward B. Fiske」，1966年7月17日）。

同年10月，葛培理出席位於德國柏林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他是大會的榮譽主席。這次大會的經費是由葛培理佈道團贊助的。出席者，包括羅馬天主教教會，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代表。

1967年

1967年11月21日，葛培理參加一個教會大合一運動的對話會議之時，北卡羅連納洲（North Carolina）天主教包曼修道院大學（Belmont Abbey College）的院長，頒發給他一個榮譽學位。

《Gastonia Gazette報》有如下的報導：

「這個星期二晚，佈道家葛培理在包曼修道院大學裡，對著1,700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講道，說：在二十世紀的這一個十年中，也就是『我們這一代過了一半時間』之中，全世界正在體驗到一次『最後的震撼』……。」

「接受了修道院大學頒授給他的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之後，葛培理才注意到那一個場合的重要性。就是『一個可以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會，和相親如兄弟的機會，這是十年前他們絕對不可能有的。』葛培理這樣說。

「葛培理第一次在一個天主教組織中講道，是1963年在修道院講的那一次。而上一個星期二晚，他回到這裡來的時候，正好是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對話的高潮。這個高潮原來是一個特別節目，部份由修道院贊助，為要增進加士頓麥蘭堡地區（**Gaston-Mecklenburg area**）內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牧同工之間的諒解。

「葛培理在這個聚會中說：『有五件肯定不會動搖，像山嶺一樣穩固的事。……最後一件就是得救之道不會改變。我知道結果是甚麼，就

是那建立這間學院的『福音』，和今天晚上把我帶到這裏來的『福音』，依然是叫我們各人得救的『福音』，完全沒有改變。』

（參「Belmont Abbey Confers Honorary Degree」，Gazette的記者Paul Smith報導。《Gastonia Gazette》，Gastonia, North Carolina 1967年11月22日）。

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爲要叫聽到的人感到驚奇一下而已。葛培理真的相信，天主教藉著聖禮帶給人半恩典半功德的福音，即是建立包曼修道院的福音，就是叫各人得救的福音嗎？如果真是這樣，爲甚麼葛培理所傳的福音強調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此外，並不需要加上功德和聖禮？爲甚麼他仍然留在浸信會裡，而不加入天主教呢？反過來說，如果葛培理不相信羅馬的福音是真的，爲甚麼他從前不表示？爲甚麼他現在頻頻與天主教來往？他想一腳踏兩船，這是不可能的。因此，許多人稱葛培理爲「兩面人」！

1969年

1969年6月19日出版的《紐約時報》，用半版來刊載一篇關於葛培理跟進技巧的文章：

「當決志者填了決志卡，陪談員也和他們交談完，坐在那邊長桌旁的一群工作人員就會立即不眠不休地，將他們所收集的決志咭分類、整理。然後根據決志咭上的資料，在地圖上，和電話簿中，替決志者找

他們住宅區內的教會。並不分甚麼新神學派、保守派、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最後將決志卡入了信封，立即寄到一千間教會去，轉交給各教會的牧者。」

（摘自美國教會聯會出版的《葛培理》，pp.67-68）

1969年9月8至13日，明尼亞波里斯（Minneapolis）舉行了一次「美國福音會議」。葛培理是這次會議的贊助人，羅馬天主教的代表也在被邀請之列。約翰奧基夫神父（John Okeefe）還負責帶領星期四早上的靈修時間。（摘自1969年11月出版的《The Baptist Bulletin》）

1970年

葛培理所贊助的「歐洲70」（Euro 70），又是一件在高科技上叫人吃驚的事件。因為「歐洲70」要將葛培理的訊息，由有線電視轉播到全歐洲各地去，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收聽到。一如以往，葛培理的產品總是帶有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色彩。因此，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市（Zagreb），有一位羅馬天主教神學院的教授指出，「『歐洲70』喚醒了『許多人的心，使我們明白到，我們這一區所推動的教會大合一運動並不是一種空談』。」

由1970年至1972年，耶穌會的查理士杜里亞（Charles Dullea）神父，羅馬主教聖經學院（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of Rome）的院長，對葛

培理佈道團的訊息和跟進方法進行研究，目的是為羅馬「貴格利大學」（Gregorian University）撰寫博士論文。因此，杜里亞神父常常與葛培理和他的工作人員會面，並且獲准研究佈道團在紐約和洛杉磯的跟進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在1973年，杜里亞將他的博士論文出版成書，取名為《天主教徒怎樣看葛培理》（A Catholic looks at Billy Graham）。這本書，我個人的圖書館也擁有一本。

根據杜里亞所形容葛培理佈道團的跟進工作，是非常吸引人的。他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如果天主教教會不肯積極參與葛培理的佈道大會，「佈道團就不會有天主教徒需要跟進」（p. 47）杜里亞這樣說：

「1970年6月，在『謝阿球場』內的一個跟進室中，我看見一大包決志卡放在一個袋中，上面註明『無須跟進』的字樣。原來這些決志卡都是屬於『天主教徒和邪教徒』的……。這些人雖然決了志，但佈道團將他們列為不需要跟進，大可以丟棄的。有人告訴我，這些天主教徒的決志卡約佔總數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摘自杜里亞於1973年著的《天主教徒怎樣看葛培理》，p.47，Paulist press出版）

這種埋沒良心的做法，就是葛培理熱心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結果。很明顯，葛培

理不肯跟進這些決志信主的天主教徒，是因為當時沒有天主教教會參加，所以他不能將這些天主教徒決志名單送回天主教教會去；如果送到基督教各教會的牧者手上，他又怕觸怒當地的天主教教會。因此，他寧願將這些天主教徒的決志卡丟棄。

1971年

1971年4月22日，「第29屆全國福音派聯會的周年大會」在加州洛杉磯舉行。葛培理在會議中，為大會的閉幕典禮講道。他形容上一次在紐約舉行佈道大會的祈禱小組，說：「其中有一些是猶太教徒，有一些是羅馬天主教徒。實際上，羅馬天主教徒有數百之眾。然而，他們都在一起禱告。」（葛培理，由D.A. Waite引述《What's Wrong with N.A.E》，1971年出版。）

1972年

1972年1月，天主教雜誌《講道與牧養匯報》（Homiletic & Pastoral Review）刊載了一篇由前文介紹過的「羅馬主教聖經學院」院長杜里亞撰寫的文章，《天主教徒怎樣看葛培理》。文章解釋梵蒂岡為甚麼要支持葛培理：

「我們天主教徒不會聽任何輕視我們教會的言論，例如：批評我們擁有無誤的教導權威、教皇或主教的特權、藐視我們的彌撒，或聖禮，或天主教儀式……等。但葛培理在這幾方面都沒有這樣做過……。我

個人認為，葛培理所講的，如果有屬於我們天主教徒不贊成的言論，也是非常少的。」

1972年4月21日，天主教聖芳濟的修道士，頒發給葛培理一個「國際聖芳濟獎」，為要嘉許「他對真正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貢獻」，和「他所傳，出於誠懇和真摯的福音」（摘自1972年4月22日出版的《Minneapolis Star》，由『F.E.A. News and Views』於1972年7月至8月引述）。為了表示感謝，葛培理這樣回應說：「我實在不配為聖法蘭西斯解鞋帶（按：聖法蘭西斯原是一位羅馬天主教『聖人』，他相信功德可以換取救恩），雖然如此，那位在十三世紀呼召法蘭西斯的基督，也在二十世紀呼召我成為他的僕人。」（摘自1996年2月出版的《The Gospel Standard》）

在密蘇里州的格連威爾城（Greenville）舉行的佈道大會中，葛培理邀請了當地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上到講台上來，與同工華夫比爾（Ralph Bell）一起讀經。（摘自D.A. Waite所著的《What's wrong with the NAE-1972?》）

同年，葛培理又與佈道家華夫比爾（Ralph Bell）一同率領佈道隊，到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布洛（Polluck）舉行佈道大會。報導形容這次大會得到「羅馬天主教的大主教，並基督教眾教會的大力支持。」（Polluck, p.152）。這次葛培理佈道大會所推動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可以說是為後來

1976年6月舉行的「研討會」鋪路。因為那一次的研討會成功地邀請了不少天主教徒參加。

1973年

1973年，葛培理推動一個橫掃北美洲的佈道大會，取名「主要講員73佈道大會」。在這個推行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佈道大會中，葛培理是最主要的講員之一。因為他是最出力拉攏天主教徒加入這個運動的。有報導指出：「葛培理在開始這個『北美洲主要講員73佈道大會』之時，他引用教皇保祿廿三世的傳記來作見證，說：這本書代表了教皇對馬利亞和歷史上許多聖人的祈禱，因此，這本書可以稱為「靈修的經典大作」。（摘自Wilson Ewin所著的《The Chilling Significance of Pope John Paul's October 22, 1996 Address: The One World Church》p.14）

1973年10月21日，葛培理又在米爾瓦基（Milwaukee）這樣說：「上周我在一個天主教大教堂中，為一位好友雅各高利（James Strohn Copley）的喪禮講道。他原是一位天主教徒（出版商），出席者之中，還有好幾位主教和大主教。當我坐在那裡，參加安息彌撒時，我感受到，那一次的彌撒實在非常美，簡直非常清楚而直接地將福音刻畫出來。因為整個過程中，神父指導我們何時站起來，何時跪下，何時應該作甚麼。」（參《葛培理》，Church League of America, p.84）

葛培理認為天主教的彌撒非常清楚地刻畫出福音來。我感到希奇，他會相信，一個神父在祭壇上將基督重新獻為祭，就是真福音！天主教的彌撒不是用來記念主在十字架上被獻為祭，乃是不斷地將基督殺死，獻為重複又重複的贖罪祭。根據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所確認的，彌撒就是「基督在十字架被獻為祭的延續」。而且，「基督藉著祭司的手，將自己獻與父神，成為不流血的祭，這樣就可以拯救這個世界。」（摘自第二次梵蒂岡會議，《The 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urgy》中的 "Instruction on the Worship of the Eucharistic Mystery, Introduction," C1,2 p.158）這不是保羅和其他使徒所傳的福音。聖經中的福音指出，基督只一次獻上，就永遠有效地除去我們的罪。聖經也絕對沒有提及，要在教會裡組成一群特別的祭司（彼前2：5、9指出，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以便獻上特別的祭。因為跟本沒有這個需要。我們的大祭司耶穌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獻祭的事。到了1973年10月尾，葛培理又在密蘇里州（Missouri）的聖路易斯市（St. Louis）舉行佈道大會。一位天主教大主教約翰拜爾（John T. Byre）在一份每週出版的《聖路易匯報》中說：「從葛培理的佈道神學來說，我們天主教徒對他所講的信息，沒有甚麼不同意的地方。他非常努力地避免因為不同聖禮，和不同教會而帶來的衝突。我們中間也有五十多名修女在他的佈道大會中做陪談員，還有另外一些修女也經常參加他的詩班。」（參Wilson Ewin所著的《Evangelism : The Trojan Horse of the 1990s》。）

1974年

1974年8月，葛培理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舉辦了一次影響非常廣的「國際福音遍傳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那一次，他邀請了三位天主教神父出席。

1976年

1976年9月，有報導指出，天主教在佛羅里達州高泉市（High Springs）的聖馬德蓮蘇菲天主教教區（St. Madelaine Sophie Catholic parish），購置了一所電影院，將它重新裝修，供天主教教區使用。葛培理佈道團的「世界影片」（World Wide Pictures）就與這個天主教區簽了合約，要借用他們這所新教堂來播影宗教影片。所得的一切收入，全部撥歸這個教區，用作宣傳天主教。（參 BFT #565, Hayes Minnick, Orlando, Florida.）

1976年10月，天主教一份報刊《南方的十字架》（Southern Cross），引述葛培理的話，說：「我認為基督徒在回應天主教對馬利亞的立場之時，實在輕視了馬利亞的地位。在婦女之中，馬利亞實在是世上最傑出，和最蒙福的女性。」（Minnick）可見葛培理不但沒有責備天主教關於馬利亞的異端思想，反而利用這一點在天主教徒中大耍手段。

1977年

1977年，當葛培理佈道團在南卡羅連納洲的艾西維市（Asheville）舉行佈道大會之時，他借用

聖羅蘭士天主教教堂（St.Laurence Catholic Church）作為佈道大會的其中一個後備禮堂。1977年，葛培理又在天主教的「聖母院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舉行佈道大會。《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有如下報導：

「葛培理會不會在梵蒂岡舉行佈道大會呢？如果場地許可的話，羅馬天主教領袖們也同意的話，相信他是會的。雖然葛培理佈道團的行程表還沒有列出到天主教總部去的行程，但是上月他一連五天在『聖母院大學』舉行佈道大會，證明他並不懼怕到羅馬天主教的總部去佈道。同時有許多證據顯示，從前一度對基督教敵意的天主教地區，現在對葛培理也變得友善，並歡迎他到訪。葛培理的信息在世界各地都是備受歡迎的，因為他經常提及天主教的主教善富頓（**Bishop Fulton Sheen**）和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摘自1977年6月3日《今日基督教》。）

葛培理在「聖母院大學」佈道大會中，邀請與會者決志的講話，其實是玩弄天主教各領導階層的手段。他向群眾呼籲說：「你們今天晚上有許多人來到這裡，是為要表示重新堅信你們從前在堅信禮所表示的。就是重新確認，你們進入教會之時所決志相信的。」（摘自Wilson Ewin著的《The Assimilation of Evangelist Billy Graham》。）很明顯，葛培理呼召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天主教徒能做一個更忠心的天主教徒。怪不得他被差不

多所有天主教領袖讚賞不已。但是，如果一個傳道人真的愛那些羅馬天主教徒，他就必定坦白地告訴他們，羅馬天主教的福音是錯謬的，聖禮是絕對與聖經所講述的救恩毫無關係的。

在1977年11月，葛培理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佈道大會。《今日基督教》的總編輯夏露連西（Harold Lindsell）引述葛培理佈道團的話，說：「當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期望才好，因為菲律賓的基督徒數目少得很可憐。可是，當我們舉行佈道大會的時候，我們見到這裡的教會非常願意聯合起來，這是我們在過往甚少見到的。而且，這裡的天主教教會也表示極力支持我們。」（摘自《今日基督教》，1977年12月30日）。

1978年

1978年8月，當葛培理在米爾瓦基（Milwaukee）舉行佈道大會時，羅馬天主教的大主教倫伯域蘭（Rembert Weakland）發出一封公函，給予他所管轄的大主教教區，告訴教區內所有神父可以支持葛培理的佈道大會。這封信一出，葛培理就得到一批「忠心的支持者」，因為他們不但每晚出席聚會，而且還參與佈道會的工作。根據9月7日《今日基督教》的報導，「葛培理在講道之中…，特別留意關心這些天主教徒。因此，他在每一個聚會都故意提及教皇保祿二世最近所說的話，用來誘導這些天主教徒決志。他說：『教會在傳福音的事上，最優先的對象，應該是那些已經接受洗禮的。』最後一天，他在主

日崇拜中講道時，再為這句話做一個結論，說：『也許，許多人需要前來決志，以求再一次堅定他們從前在堅振禮所堅信的。』（Ewin）「藉決志來堅定堅振禮所堅信的」並不是福音，也不是聖經所形容的救恩。我們知道，天主教認為得救是一個過程，由受洗那一天開始，要不斷藉著聖禮來加強和維持自己的救恩，直到死時為止。因此，對於一個天主教徒來說，「藉決志來堅定堅振禮所堅信的」，意思是他要繼續相信天主教的聖禮能帶給他救恩，而不是從那些死行的功德觀念中悔改出來，轉而單單相信耶穌基督已經完成的救恩。

1978年10月，葛培理又在波蘭這個天主教國家裡舉行佈道大會。那一次可以說是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史無前例最好的機會。因為10月7日，當葛培理來到華沙之時，《芝加哥星期日時報》（Chicago Sunday Times）就有如下的報導：「美國佈道家葛培理在周五受到羅馬天主教會的歡迎，這是教會第一次對葛培理開放，讓他的佈道團可以前來在這裡舉行佈道大會。」華力地露米斯奧力主教（Bishop Wladyslaw Miziolek）在奧基斯機場（Okęcie Airport）迎接葛培理的時候，對他說：『我們很高興，你肯來到我們中間，在這裡幾個城的天主教大教堂中主領佈道大會。你將會見到，這裡的聽眾，絕大部份都是天主教徒。』米斯奧力主教是波蘭天主教「教會大合一運動委員會」的主席。

米斯奧力主教在機場迎接葛培理之時，還替波蘭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史蒂芬威斯利紅衣主教（Stefun Cardinal Wyszynski）帶來問安的話。葛培理的回應表示，這一次的創舉，正代表著一種新的合作精神，藉得其他國家的基督徒仿效。（參 John Pollock 所著的《葛培理》一書, p.308）

羅馬天主教的領導階層准許葛培理在他們的大教堂內講道，其中四次還有大教堂的神父站在講台旁邊協助他，要在他講道的前後，為會眾舉行彌撒。葛培理在這幾次的講道中，一直讚揚教皇保祿六世不已。（摘自1978年11月3日的《今日基督教》）。當時紅衣主教卡羅沃拉（Karol Wojtyla）也願意提供他那座有七百年歷史的聖安娜教堂（St. Anne's Church），給與葛培理舉行佈道大會。卡羅沃拉紅衣主教本想約見葛培理一同進餐，可是，在葛培理未到波蘭之前，他已經接到羅馬梵蒂岡的急召，要他立即前去出席紅衣主教團的緊急會議。他到了梵蒂岡之後幾天，就被選為約翰保祿二世教皇（Pope John Paul II）了。卡羅沃拉所坐的班機正在起飛之時，葛培理所坐的班機就剛剛抵達華沙。

葛培理在波蘭還抽時間到捷克（Czestochowa）去參觀光輝山（Jasna Gora）上的馬利亞神龕；這光輝山以黑色麥當娜聖像為特徵。葛培理到捷克去朝聖的照片，還刊登在1979年2月的《決擇雜誌》（Decision Magazine）上。從天主教徒的觀點來說，這次葛培理參觀馬利亞神龕，象徵著認同人們可以崇拜馬利亞的偶像。教皇保祿二世從小孩到長大成為波蘭天主教領袖之時，都常常

到這座神龕來朝拜。其實這種褻瀆神的拜偶像行爲，是完全沒有聖經根據的。教皇在他所著的《跨過希望的門檻》（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ope）一書裡頭，見證他自己養成對馬利亞崇拜的習慣「…是在我所住的城、後來又在嘉華利亞（Kalwaria）、最後在光輝山（Jasna Cara）等聖母神龕養成的。」（第220頁）因此，教皇在他的教袍上，刺繡了『全是妳的』的字樣，標誌著他爲馬利亞的緣故，捨棄一切（參《跨過希望的門檻》，第215頁）。後來教皇在1981年5月遇刺，他卻將自己痊癒的功勞全歸與馬利亞，並且特地來到光輝山，和花地瑪這一類「聖地」的馬利亞神龕，向「天后」表示感恩。

1979年

1979年5月，葛培理又在澳洲舉行佈道大會。記者阿倫尼哥拉（Alan Nichols）在《今日基督教》雜誌上，報導他如下的觀察，說：

「佈道大會舉行之之前，天主教的參予一直受到爭議……。當佈道團的執行委員會宣佈，決志者將會被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之時……。最後，大家達成共識：所有天主教背境的決志者，將會被轉介到非宗派教會去接受跟進。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這些教會裡考慮清楚，決定今後隸屬於那間教會。」

（摘自1979年6月29日的《今日基督教》）

請注意，上述所描述的，表示葛培理佈道團一直以來在各地舉行佈道大會，都習慣了將決志

者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只是來到這城，遇到了反對勢力，他們才同意將決志者安排到非宗派教會去。很可能他們將天主教的決志者交回天主教徒陪談員跟進，因為根據1979年3月8日的《教會實況》（Church Scene）所刊載，葛培理訓練天主教徒做跟進工作的報導，葛培理認為這樣做可以使所有天主教徒決志者都交回天主教教會手中處理。（摘自1979年4至5月的《福音行動》（Evangelical Action），第4頁）

1979年，葛培理佈道團在米爾瓦基（Milwaukee）舉行佈道大會時，天主教甚至為所有初信者舉行彌撒，作為跟進工作的一部份。（摘自1986年5-6月的《F.B.F. News Bulletin》）

1979年9月米爾瓦基的《基督徒速遞》（The Christian Courier）雜誌更刊出如下的報導：

「羅馬天主教米爾瓦基大主教區의 『教會大合一運動』和『宗教對話委員會』的主席慕蓮合堅修女（Sister Maureen Hopkins），她同時也是葛培理佈道團的聯絡員，她報導天主教教會裡頭有**120位天主教徒自願幫助她去聯絡3,500名決志者**。慕蓮合堅修女是從葛培理佈道團提供的決志卡上，得知決志者的電話、地址、和是否屬於天主教背境的資料。結果，這3,500位決志者，全部被邀請去參加8月16日在米爾瓦基聖德勒撒教堂（St. Teresa's Church）所舉行的聖餐

禮拜。出席者共有400多人。舉行這個彌撒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這些決志者，必須在天主教教會內，藉著接受聖禮來表示他們對基督委身。這樣才能得救。」

1979年9月7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指出，差不多在佈道大會舉行之前一年，葛培理已經差派了一組工作人員，到米爾瓦基那裡去，為那些神父和平信徒舉行一個訓練聚會，解釋佈道團的運作。根據約翰雅斯本（John Ashbrook）的報導：「非常可悲，佈道團竟然將3,500張決志卡交給天主教教會。但更可悲的，還是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事，而是這位世界知名的佈道家葛培理所親自策劃的。」（摘自 John Ashbrook 的《New Neutralism II》）

1979年10月，教皇約翰保祿二世第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時代》雜誌這樣引述葛培理驚人的觀點，說：

「現今在世上，再沒有一個人像教皇保祿二世那樣，在道德和屬靈的事上，能叫人如此佩服的。他所說的，正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傳統上所教導的。例如十誡，和登山寶訓的道德觀。全國上下對他的講論都有熱烈的回應。這表示，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屬靈的饑渴。教皇亦已經得到數以百萬計新教徒的心。『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似乎是背後的火把，使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共同分享共通的信念，例如『基督為童女

所生』，和『基督復活』之類的信念。」

（葛培理，1979年10月15日《時代雜誌》）

1979年10月11日，葛培理又在菲杜南胡（Phil Donahue）的電視節目中出現。他談論到教皇保祿二世訪問美國之行，說：「我想，美國人正在尋找一位道德和靈性的領袖。在這方面，教皇實在勝任有餘。因為他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不會避諱不言。事實上，他在波士頓那一次演講，內容是非常福音性的。因為他邀請人們來到主的跟前，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主。因此，容許我在這裡說：『感謝神，從今以後，我有他所講的話，作為真正有權威的引證了。』（摘自，1986年2月《福音報》（The Gospel Standard））

1979年12月9日，著名的天主教大主教善富頓（Fulton J. Sheen）逝世。善富頓主教是羅馬異端信仰的維護者，（請參閱《1950年》記錄）同時也是新約信仰的仇敵。當有人問及葛培理對善富頓去世的感受時，葛培理表示：「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損失。因為他打破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圍牆……。我個人以認識這位朋友超過三十五年為榮。我為他的死而悲哀，但盼望在天上，我們能相見。」（摘自1979年12月11日《Religious News Service》）。正如我們在前文「1950年」分題下所指出的，善富頓認為他得救的盼望是在於馬利亞，不是在於耶穌基督已經完成的救贖恩典。除非善富頓臨死前真正悔改，全心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否則，沒有任何聖經根據證明他可以上天堂。

1980年

根據1980年1-2月所出版的《星期六晚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報導，葛培理接受記者訪時表示，他對教皇有如下的觀感：

「從教皇保祿二世登位開始，他的一切表現都顯示出，他是當今世上最偉大的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道德和屬靈領袖……。他以一個國家領袖，和一位牧師的身份來到美國訪問。但我個人相信，他也是以一個『佈道家』的身份來勸勉那些一向很少思想屬靈事物的人，重新思考基督的真理，委身歸向基督。……教皇在這世代向所有心靈飢渴的人所傳講的信息，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所有基督徒向各時代心靈飢渴的人所講的信息。因為都是將人引導到基督面前來……。因此，越來越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都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實在共享著相同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將他們聯繫起來，叫他們互相信任……。最近，我才學會"pontiff"這個字（這是教皇的稱號），明白它原來是來自一個拉丁字，原意是『築橋者』。教皇這一次訪問美國，其實就是在『築橋』，這是我們現今這個四分五裂的世代所非常需要的。我們這一代迷失了方向，教皇的呼聲就在這方面不斷地提醒我們，我們對人和對神都是有責任的。」

（摘自1980年1月至2月《星期六晚報》，葛培理，《The Pilgrim Pope: A Builder of Bridges》）

其實，"pontiff"這個字，在歷史上是用來稱呼教皇的。它的全名是"Pontifex Maximus"，是羅馬帝國古代異教大祭司所用的稱號，後來才被早期教皇所借用。（參 Webster's Deluxe Unabridged Dictionary，1979 second edition）。但是，「古羅馬帝國的皇帝，卻硬要為自己保留『Supreme Pontiff』（至高的築橋者）這個稱號，因為他想要做羅馬眾祭司的元首，叫他成為人和神之間的『橋樑』。只是到了公元375年，教皇格拉提（Gratian）才成功地將這稱號奪過來…。」（參《Our Sunday Visitor's Catholic Encyclopedia》p.758）不錯，"pontiff"這個字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都是「橋」的意思。但幾年前當我遊覽梵蒂岡的時候，我買了一幅羅馬地圖，發現"pontiff"這個字是用來形容羅馬城內，提比河（Tiber River）流域許多跨河的橋樑。因此，教皇用這詞來形容他是人和神之間的橋樑，實在含有褻瀆的味道。

1981年

1981年1月13日，葛培理跟羅馬教皇保祿二世第一次會面。葛培理對於這次歷史性會面有以下的描述：「我跟教皇有半小時非常私人和親切的會談。他對我非常熱情，同時對我的工作也感到非常有興趣。我們談及我們的信仰，包括我們所同意的，和所不同意的部份。當我在梵蒂岡的時候，我有機會在『北美學院』（North American College）講道。這所『北美學院』其實是為從美國來的天主教神學生而設的神學院。我知道，我

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新教徒在這間神學院裡講道。但那一次聚會，可以說是非常感人，和以基督為中心的聚會。整個聚會還用了許多流行音樂來敬拜。」（摘自1981年7月17日《今日基督教》）葛培理還送給教皇一份禮物，那是一個刻有牧羊人和羊群的木刻藝術品。這個藝術品標誌著教皇所宣稱的，他就是全地所有基督徒的大牧者。

1981年7月，葛培理的「世界福音會議之洛桑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又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市（Kansas City）舉行為期四天的「美國福音節」（American Festival of Evangelism）。在八千名參加者中，有大量是羅馬天主教徒。偉信依雲（Wilson Ewin）報導這次會議所推動的教會大合一運動說：

「1981年在密蘇里洲舉行的這一次『美國福音節』，大大澄清了我們對『洛桑委員會』所存疑問，就是我們一直懷疑他們對羅馬天主教教義，和對天主教徒所持的是甚麼態度的疑問。」

因為這些會議不是討論天主教徒的需要，和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反而是在強調應該與天主教合一，和在教義上與他們合作。會議又指出，「洛桑委員會」全體成員不再相信需要向天主教徒傳福音。反之，他們相信天主教可以用自己的傳福音方法來產生他們自己的天主教徒，藉以鞏固天主教的體系。這一點可以從大會舉辦了幾個天主教的工作坊而肯定。佈道事工被看為怎樣成為及怎樣使人成為好天主教徒的事工。

爲了報導天主教在大會中的工作，美國天主教靈恩派在1981年10月，出版了一份《新約雜誌》（New Covenant Magazine）。其中的文章報導：「依利諾州，羅克福（Rockford）教區，負責福音遍傳的格蓮史密夫神父（Fr. Glenn C. Smith）指出，『依利諾州，卡利市（Gary）的聖彼得和聖保祿教堂，因爲他們努力不懈地傳福音的緣故，這十年來，聚會人數由一千人增加到六千人。而且每年復活節，都有100多人領洗加入教會……」。來自南卡羅萊納州格連維爾市（Greenville）的保羅派修士，肯尼夫神父（Fr. Kenneth Boyack）還說：照計劃，在這些教區內組織福音佈道辦公室，和福音委員會，應該可以在1990年之前，增加更多會眾。」

由此可見，「洛桑委員會」所舉行的「美國福音節」，爲羅馬天主教古代及中世紀的錯誤教義，蓋上了完全可以接納的印記，表示全面支持。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來自**150個**宗派教會，和福音機構的代表。因着他們的參與和聯繫，他們都表示願意接納，和與羅馬天主教合作。（摘自偉信依雲的Charismatic Control）

1982年

1982年春，葛培理於在濃厚天主教色彩的「新英倫省」（New England）舉行佈道大會。大會前，葛培理先到波士頓去探訪麥得羅紅衣主教（Medeiros）。之後，這位麥得羅紅衣主教在三月

召開一個「互惠互關」的研討會。接著又在5月25日舉行一個「策略諮詢會議」。結果，這位紅衣主教在一份雜誌中公開說：「我很高興，我能夠邀請到葛培理和他的幾位同事，一同到我家中來吃晚飯。」（摘自1982年5月28日《The Pilot》）當時大主教區的聯絡主任，恭利神父（Conley）也這樣說：「葛培理佈道團的目的不是拉羊，或叫人離開自己的教會…因為我們有**100**多位神父、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一同受訓，要幫助葛培理佈道大會中決志信主之男女信徒，重新與羅馬天主教教會恢復關係。」（摘自1982年5月11日的《The Pilot》）

「我們在每一個州都可以看到，為佈道會每一件事，佈道家葛培理必定先諮詢我們的主教。佈道會之後，葛培理佈道團也和我們的神職人員舉行各種會議，將那些決志信主的名單送回我們天主教教會手中。其中1982年六月九日晚，在麻省威士頓教皇約望廿三世神學院舉行的那一次，就有超過二千一百位決志者送到我們的神父和修女手中。」（參Wilson Ewin著的《The Trojan Horse of the 1990s》）

1982年5月，葛培理到蘇聯進行六天訪問。為這次訪問，他承認事前曾經向梵蒂岡官員諮詢過，請教他們怎樣與蘇聯交往，才能叫他的訪問更順利。（摘自1982年5月24日出版的《Arkansas Democrat》）。

1982年8月，葛培理在華盛頓州的史樸京（Spokane）市舉行佈道大會。那份1983年九月二日出版的《佛羅理達天主教》期刊報導指出：「當葛培理呼召的時候，有超過1,700名天主教徒再次決志歸主。此外，在米爾瓦基（Milwaukee）舉行的那一次，我們的大主教亦准許天主教教徒參加聚會，有超過4,000名天主教徒決志。」所有這些決志者，全部被送返天主教教區接受跟進。

1983年

在1983年，葛培理在佛羅理達州的奧蘭度（Orlando）舉行佈道大會。有超過六百名決志者被送返天主教教會接受跟進。這是《佛羅理達天主教》這份天主教刊物所報導的。現在讓我將這篇報導其中一段文字引述給讀者看：

「這次參加佈道大會的人數，高達十八萬之眾。其中約有六百名天主教徒跑到台前，表示決志，和接受陪談……。雖然天主教並沒有贊助奧蘭度這一次為期八天的佈道大會，仍有約150名天主教徒和陪談員，於四月二十日集合到聖雅各大教堂（St. James Cathedral）來，協助做跟進工作。葛培理佈道團的馬歇爾（**Rick Marshall**）為我們提供所有天主教徒決志者的名單。」

（摘自1982年9月2日出版的《佛羅理達天主教》）。

1983年也是「阿姆斯特丹83佈道會議」的一年。這次會議是葛培理第一次為世上許多巡迴佈道

家而設的。說清楚一點，這其實是徹頭徹尾的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會議。葛培理在會議中這樣說：「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三十多個宗派教會的佈道家，其中包括改革宗、浸信會、衛理會、聖公會、信義宗、東正教、五旬節會、和許多其他宗派，包括梵蒂岡，和蘇聯東正教高層領導人。（摘自1983年出版的第四期《Foundation》）

1983這一年，葛培理同時游說當時美國總統朗勞列根（Ronald Reagan），應該與梵蒂岡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下所引述的一段文字，是摘自約翰艾舒本所著的《New Neutralism II》：

「昨天一份報章報導：葛培理的發言人證實，葛培理是列根總統決定與梵蒂岡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幕後推動人。

「其實早在1983年初，總統和他的顧問威廉卡特（William Clark）已經請求葛培理，私下向多名基督教領袖作非正式的諮詢，是否應該與梵蒂岡建交。這是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葛培理佈道會的一位公關主任當勞比利（Donald Baily）報導的。

「《芝加哥星期日時報》也得到一封信的副本。這封信是一位浸信會佈道家寫給卡特的。整封信長達7頁紙，其中引述葛培理一句話，說：『如果問，誰能做到這事，

而又不至被這事連累的，那就是列根先生。』」

（摘自美國湖縣Associated Press出版社1984年2月9日出版的期刊《News Herald》，其中一篇由Ashbrook書寫的文章：《Graham's Help on Vatican Ties》）

1984年

1984年10月14至21日，我們又發現葛培理在加拿大BC省溫哥華主領佈道大會。大會的籌委會副主席，百屋聯合教會（Bringhouse United Church）的大衛克林（David Cline），解釋他們如何處理天主教決志者的政策，說：「如果有天主教徒前來表示決志信主，我們絕對不會改變他們的信仰，只將他們的名字交還給他們同區的天主教教會。」（《溫哥華太陽報》，1984年10月5日）

那一次大會，天主教的占士加尼大主教（Archbishop James Carney）還請他們教區的神父和會眾，特別為葛培理的溫哥華佈道事工祈禱。聖母玫瑰大教堂（Holy Rosary Cathedral）的文森學斯偉神父（Priest Vincent Hawkswell）又特別向會眾解釋，葛培理這一次在溫哥華舉行佈道大會，對天主教是十分重要的。（《太陽報》1984年10月9日）

原來，葛培理未到溫哥華之前約一個月，教皇先來做足準備工夫。及至葛培理來了，葛培理又在講台上大事推介教皇。他指出，當他到蘇聯訪問之時，路途中有一個早上，他兒子富蘭克林

（Franklin）前來弄醒他，要他快快收聽教皇在溫哥華電台所講的信息。後來一份雜誌引述當時葛培理這樣回答他的兒子，說：「讓我告訴你，教皇所講的，與我一直以來所聽過福音派的福音毫無分別。他講得很好，我非常欽佩他。他所講的，正是這個道德失迷的世界所需要的。」

1983年蘭度吉爾摩牧師（Pastor Randal Gilmore）寫過一封信給葛培理佈道團，詢問他們最近在城裡播影的一套影片，名叫《浪子》的事。結果他得到如下的回覆：

問：那些決志信主而沒有教會的人，請問你們會怎樣安排？

答：我們會將他們轉介到他們本區的委員會。委員會的人又會將他們轉介到一間以聖經為本的教會去。當然，我們絕對不會將他們轉介到諸如『基督教科學會』之類的教會的。

問：決志信主的天主教徒又如何？你們會怎樣做？

答：我們會告訴神父。

問：你們會指導他們到另一間教會去嗎？

答：絕對不會！

問：你剛才引『基督教科學會』為不以聖經為本的教會。那麼你以為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以聖經為本來教導人嗎？

答：我們的理論是這樣：我們認為一個初信者就像一隻活小雞一樣。活小雞是不會到死母雞那裡去的。

問：你想要說的是，羅馬天主教教會就是一隻死母雞？

答：不，我完全不是這樣的意思。我們認為，死母雞是指那些教導人頭髮不應該超過某一個長度的基要派教會。他們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得救。（摘自1984年6月《浸信會通訊》）

請看，教會大合一運動的鼓吹者，對差不多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可以容忍和接受而不加批評，唯獨對他們認為極其可怕的基要派基督徒，就認為忍無可忍了。這一點證明葛培理佈道團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教導人藉行為來賺取救恩的羅馬天主教教會（他們以不符合聖經定義的『恩典』作為掩飾），他們就認為是剛決志信主者最安全的地方，可以把他們送到那裡去。反過來，主張單靠基督，只因信就可以稱義的基要派教會，他們就認為是最危險的，不應將剛決志者送到那裡去。因為這些教會認為，遵從神的話（包括林前11章），只不過是得救的信徒的責任，並不是得救的途徑。（弗2:8-10）

1984年5月，葛培理指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為美國青少年的英雄典範。（參1985年11月15日出版的《Calvary Contender》）。

1985年

1985年9月7日至17日，葛培理在羅馬尼亞的基督教、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教會中舉行佈道大會。「他在明尼亞波尼斯的佈道會籌委會指出，這次葛培理前來講道，是由羅馬尼亞十四個宗派教會發出邀請的。當地政府將他們組織起來，並由羅馬尼亞東正教教會外交事務部主席，川士凡尼亞的安東尼大主教（Metropolitan Antonie of Transylvania）簽署。（《基督徒新聞》，1985年9月2日）

離開羅馬尼亞之後，葛培理來到匈牙利傳道。1985年11月22日的《今日基督教》雜誌指出，不同宗派的領袖都在台上與葛培理同坐。在布達佩斯（**Budapest**），拉撒路力凱紅衣主教（**Cardinal Laszlo Lekai**）也坐到講台上。在柏斯（**Pecs**），約瑟夫沙赫堤主教（**Bishop Jozsef Cserhati**）也以東道主的身份來招待葛培理，向會眾加以推介。而且早在數周之前，他已經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區內所有天主教教會的信徒，敦促他們務必出席葛培理的佈道大會。在大會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一同攜手合作，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詩班也一同獻詩。這次大會是由聯合浸信會（**Baptist Union**）、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s**）、五旬節教會（**Pentecostals**）、並循道衛理公會（**Methodists**）聯合籌辦的。據說，這樣的聯合大會，是匈牙利有史以來最有教會合一運動意味的聚會。（參『印度國家基督教協進會』1986年5月出版的《國家基督教協進會期刊》）

同年，「天主教保羅派國家福音協會」（Paulist National Catholic Evangelization Association），和丁道爾書樓（Tyndale House Publishers）聯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向成人傳福音，基督徒可以學到甚麼功課》。這本書其中的一章由葛培理書寫，他藉所說的「福音」來呼籲所有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要更多合作。書中還有幾篇文章，分別由約瑟夫包納丁紅衣主教（Cardinal Joseph Bernardin）、羅拔舒勒（Robert Schuller）、比爾布賴特（Bill Bright）、杰克華生（Jack Wyrzten）等人書寫。

1987年

1987年，葛培理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Denver）舉行佈道大會，得到當地天主教上上下下全體的支持。葛培理佈道團還訓練了數十名天主教徒做陪談員，每晚數以百計跑到台前的決志者被送到天主教教區去接受跟進。

「丹佛的羅馬天主教大主教占士佳斯（James V Casey），在三月中突然離世之前，曾經承諾與葛培理佈道團合作，並且表示：『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參與。但我所關注的，是你決志歸主之時，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你十分需要有一個基督徒群體來支持你。當然，我個人希望你們在我們天主教的群體中，能找到這樣的支持。』」（參1986年5月Moody Monthly）

丹佛天主教聖經學校的總幹事，馬堅娜史葛修女（**Macrina Scott**）這樣說：她訓練了大約**80名**陪談員和聖經教師，協助葛培理在洛磯山舉行的佈道大會。（《**Christian Beacon**》，**1987年7月**）另外聖猶達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神父，當勞偉歷（**Donald Willette**）也訓練了**6,600名**陪談員來幫助葛培理。由此可見，天主教給予葛培理佈道會的支持，是非常可觀的，當然天主教自己的收穫也非常可觀。偉歷的報告指出，平均一次佈道會，就有**500多位**決志者的資料轉介到丹佛郊區的聖湯馬士羅馬天主教教會去。（參Wilson Ewin所著的《**Evangelism : The Trojan Horse of the 1990's**》）

這些天主教教會怎樣處理這麼多轉介給他們的決志者？根據丹佛市最暢銷的報章《洛磯山日報》（**Rocky Mountain News**）1987年7月25日的報導指出：「在天主教堂裡，大量天主教徒在等候，要幫助天主教徒向母會表達自己的新信心，或更新了的信心。」這是天主教的標準教義，他們從來不會教導人決志信主得救；只說信心更新。因為他們相信要不斷向教會、教皇、神父、聖人和聖禮，更新自己的信心才能得救。

天主教的領袖早已明白，不用害怕葛培理的佈道會會改變他們的信仰。他們反而利用葛培理來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又利用葛培理的佈道大會來尋回沒有實質信仰行動的天主教徒，甚至還可以將基督教徒也拉到天主教堂去，日後他們就會變成天主教徒。葛培理在呼召時，說：「凡接受基督的…」、「請踏出信心的第一步…」、

「今晚請來到基督面前…」或「請向基督委身…」。這樣的呼召都是非常含糊的，足以讓天主教有機會將他們的聖禮福音插在其中。而且，葛培理經常與天主教合作，並沒有對天主教教義作出半點警告。這使我們聯想到，他必定同意他們的信仰。事實上，葛培理確實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天主教神父教導決志者，其實早在他們受洗之時，已經重生得救了。只是，他們必須繼續不斷地藉著各種宗教儀式，諸如彌撒、家庭責任、念珠祈禱、甚至在佈道會中再決志…等來維持自己得救。若有人懷疑筆者所說的，是否真實情況，請他再參閱1987年丹佛佈道大會的另一份報告：

「星期一，當洛磯山葛培理佈道大會的5,000人詩班在唱『照我本相』（Just As I Am）的時候，數以百計的決志者，應葛培理的呼召而蜂湧上前，表示要重新決志信主，或更新自己的信仰。有一個天主教徒想要從通道上走出來決志，只是他不明白『重生』是甚麼意思，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自己的感受。因此陪談員就跑過去向勞偉歷神父（Donald Willette）請求幫助。勞偉歷神父本是6,600名陪談員的總領導，他早就站在距離講台不到三十碼的地方，等候隨時作出援助。星期二，勞偉歷神父在佈道會開始之前解釋說：『對於那些難以明白何謂"重生"的天主教徒，我通常都是按照天主教教會的教導來幫助他

們明白這樣的經歷的。」（《洛磯山新聞》所報導的《陪談員協助決志者回應葛培理的呼召》，1987年7月25日）

根據這篇報導，和其他數以百計可以隨時參考的報導，葛培理確實容許羅馬天主教徒和神父，站到他的講台前，為葛培理所傳講的信息，「按著教會所指示的意思」（指天主教）重新演譯。這樣做，對信息造成非常的混淆。試問世上還有甚麼別的做法比這更愚拙，和更奸惡呢？

當佈道大會結束時，天主教教會可以獲得豐富的收穫，不單是因為許多人歸回羅馬天主教教會，更因為整個社區對天主教產生非常的好感。這要多得葛培理的佈道團所推動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因為這運動將合一的範圍擴展到天主教。

1988年

1988年8月，葛培理佈道團贊助在芝加哥舉行一個名為「會議88」的全國福音節。這次會議還有芝加哥天主教教區聯合贊助。芝加哥的紅衣主教約瑟伯納丁（Joseph Cardinal Bernardin）也是這一個會議的主要講員。「會議88委員會」卻拒絕了新罕夏州（New Hampshire）納舒華聖經浸信會（The Bible Baptist Church of Nashua）的申請，要為大會展出向羅馬天主教徒傳福音的書籍和刊物。他們回信給這間浸信會表示：「鑑於這次『會議88』是由基督教各大宗派教會，和全國天主教福音協會共同贊助的，所以單單准許一方贊

助團體擁有特權，向另一個贊助團體傳福音，是不合宜的。我們既然與相信同一個福音的羅馬天主教合作，我們就無法批准這樣的展覽在我們的『會議88』中舉行。」（Wilson Ewin所著的《Evangelism: The Trojan Horse of the 1990's》）

1998年11月18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雜誌，刊出一篇文章，在葛培理七十歲大壽，對他大加讚揚。肯尼康沙（Kenneth Kantzer）有這樣的觀察，說：「今天在出席葛培理巡迴佈道大會的各大宗派之中，羅馬天主教成了最多人出席的宗派。」循道會的馬田馬提（Martin Marty）在美國福音派路德會也這樣說：「任何城鎮，如果想要邀請葛培理前來主講佈道大會，除非他們廣泛地得到各大宗派教會支持，所舉行的是全城聯合佈道大會，否則葛培理會拒絕這樣的邀請。如果他看不見聯合循道會的主教也出席，甚至從1965年開始，他還盼望天主教的主教也出席，他就不喜歡站到講台上講道。」

1988年終，葛培理告訴《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導》雜誌（US News & World Report），說：對他來說，神學思想再算不了甚麼。他又指出：「我周遊世界列國，認識各大宗派的神職人員，結果我被模造成為一個以教會大合一運動為重的人。一直以來，神學思想將我們分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文化和種族也將我們分開。所以現在這些對我來說，都算不了甚麼。」（《U.S News & World Report, 1988年12月19日》）

1989年

1989年，葛培理來到倫敦舉行他的「89佈道大會」。比素曉紅衣主教（Basil Hume）有以下的表示：

「在這國家裡，我們身為天主教教會，應該盡可能與葛培理的『89佈道大會』合作…。我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我相信神的恩典會在這次佈道大會中工作。倘若佈道大會能幫助人們回歸自己的教會，這就是好事了。」（《Foundation》1989年11至12月）

比素曉紅衣主教的「教會合一運動」顧問米高斯（Michael Seed），描述這一次招募天主教徒來參加葛培理的組長訓練課程，說：

「背後的理念是這樣，在六月晚間佈道大會中前來表示決志的人，倘若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就應該引導他們到同區附近天主教教堂所派來的陪談員那裡去。至於沒有固定教會的決志者，我們就問他們，是那一間教會的信徒帶他們來的，我們就將他們送返那間教會。……我們的紅衣主教已經跟葛培理博士打過招呼，而且會在佈道大會之前，先與葛培理博士會面。我們知道，葛培理博士確實是一位真誠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的佈道家。」

1989年7月，米高斯又寫了以下的報導：

「葛培理博士在6月13日佈道大會前，先拜訪過比景曉紅衣主教。而我和我們的紅衣主教都一同出席6月26日星期一，在伊域士球場舉行的佈道大會。結果，倫敦這次佈道大會約有2,100名來自西敏寺各教區的天主教徒決志。這實在太好了。葛培理幫了我們教會一個大忙，因為在他偉大的服侍下，許多天主教徒的信心都得到更新。」

（參Ashbrook著的《New Neutralism II》）

北愛爾蘭的羅馬天主教歌星丹娜（Dana）也在倫敦的溫布來大球場與葛培理一同出現。（《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1989年7月10日）

1989年9月，葛培理又在亞肯色州的小石城（Little Rock, Arkansas）舉行佈道大會。「這次佈道大會是由美南浸信會、靈恩派教會、和新神學派教會聯合舉辦的。不但如此，還有羅馬天主教大主教也非常熱心與葛培理合作，一同訓練工作人員，期望最少有600名決志者可以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Baptist Challenge》1989年8月）

1990年

「1990年1月，葛培理由8日至13日，共花了六天時間與梵蒂岡一班官員會面。其中包括與教皇約翰保祿二世作私人會談。波士頓大主教區一份報刊這樣報導說：『葛培理博士說，從教皇的演講可以清楚地看到，教皇之所以有這樣的態度和果斷，全因為他有偉大而卓越的靈命。不論他的工作、他所講的信息、和所帶出的異象，都有

深厚的聖經原則為根基。」根據一幅「宗教新聞社」所拍的照片顯示，葛培理將一條產於北卡羅萊納州，他家附近，用手編織的毯子，致送給教皇。葛培理引用他的好朋友，古盛大主教（Cardinal Cushing）所說的「築橋者」來形容教皇約翰保祿二世，『確實是一位築橋者，是我們這個分裂的世代所亟需要的。』」（參Ewin所著的《The Assimilation of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葛培理第二次與羅馬天主教教皇會面。

1990年4月，葛培理在紐約市的亞爾巴尼（Albany）舉行佈道大會。以下一段文字，引自一本天主教刊物的描述：

「有近20,000人為葛培理的『1990大都會佈道大會』忙著做籌備工作，其中包括區內18個基督教宗派的代表，及一個由浩華夏伯主教（Howard J Hubbard）委任的高層天主教官方代表團。」

葛培理佈道團計劃在亞爾巴尼的力卡博卡大球場（Knicker-bocker Arena in Albany）舉行佈道大會，會期定於4月22日至29日。這次葛培理佈道團是應浩華夏伯主教，和其他宗教領袖三年前的邀請而來的。『這次佈道會，一個30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中，有9位成員來自天主教……。天主教教區官員都以葛培理佈道團為福音工具。』一位執

行委員會成員占士祈神父（ Rev. James Kane ）這樣解釋道。占士祈神父也是這個教區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委員會』的總幹事。

對於葛培理在講道中所講及關乎教義的內容，祈神父說：『其中完全沒有使我們天主教徒感到不安，或懷疑的地方。』他表示，葛培理所強調的福音，和個人與基督的關係的重要性，與天主教所教導的完全一致……。

『不過，』他補充說：『當然我們還要強調聖餐禮，和彌撒聖禮的重要性，還有教會的結構和組織，主教和教皇的重要性。』

（參《The Evangelist》Roman Catholic Diocese paper of Albany, New York，由《Foundation》1990年1至2月括引）

偉信依雲（ Wilson Ewin ）在1992年7月6日出版的《代禱信》，對於1990年6月葛培理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佈道大會，有如下的報導：佈道大會的總監力奇馬素（ Rick Marshall ），他同時也是葛培理佈道團駐明尼亞波尼斯辦事處（ Minneapolis ）的職員，他在一訪問中說：「我們全體職員和義工都很清楚明白，我們萬萬不能拉別教會的羊，改變他們的信仰。」（參1990年3月17日Montreal出版的《The Gazette》雜誌）

1991年

1991年9月22至29日，葛培理的佈道團又在密

蘇里州的聖路易市（ St. Louis, Missouri ）舉行佈道大會。這次佈道大會有聖路易市教區的大主教協力贊助。葛培理的同工華夫比爾（ Ralph Bell ）是這次的講員。當時那位大主教辦事處的總幹事文森凱亞神父（ Vincent Heier ），專門負責領導「教會大合一運動」及「與不同宗教對話事務」的，現在也成為葛培理佈道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這樣說：「我們強調的，雖然是教會大合一運動，但是參加佈道會的人，若對天主教的信仰有興趣，我們就要轉介他們到天主教教會去。葛培理向來都很贊成教會大合一的，葛培理並沒有鼓吹人們必須到那一個宗派去，他只是盡力鼓勵任何想要合作的宗派都可以接受這些人。」

聖路易大主教約翰美（ John L May ）寫了一封信給聖路易教區所有神父，鼓勵他們務必出席將要舉行的座談會，說：「在佈道大會進行中，我們需要大量天主教徒做好準備，遇到有人主動前來查詢有關天主教的資料，就接待他們。」（參 1991年5月出版《Australian Beacon》雜誌）

1991年9月29日出版的《底特律自由報》（ Detroit Free Press ）又引述葛培理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說：「所有的羅馬天主教徒都知道，我不是反對他們的。我的思想，不論對也好，錯也好，我都是代表著所有教會的。」

1991年9月，葛培理在紐約舉行的「中央公園會議」，也是得到紅衣主教約翰歐康諾（ John O'Connor ）的支持。這位紅衣主教說：「葛培理佈道團要求我們提供人手，幫助他們做陪談員，和

歡迎所有希望重返天主教信仰的人。」在聚會中，葛培理又公開感謝「歐康諾紅衣主教，和所有天主教的主教，並他們牧養的教會，今天能夠出席這次會議，與我們合作。」結果，市內630個天主教牧區之中，有200個牧區派人前來受訓做陪談員。（參1991年10月7日出版的《National & International Religion Report》）

1992年

1992年4月，葛培理在政府認可的「韓國基督徒聯會」和「韓國天主教協會」的贊助下，到北韓作出為期五天的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他有機會在一間基督教教會，和一間天主教教會佈道。在講道中，他為教皇帶來一篇信息給共產黨的金總統，而金總統亦委託他帶了一封回信給教皇。（參1992年5月18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

關於1992年6月24日至28日，葛培理在費城舉行的佈大道會，費城（Philadelphia）的大主教，安東尼貝維力嘉紅衣主教（Anthony Bevilacqua）寄了一封這樣的信給葛培理說：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們與我們的聖父教皇聯合在一起，完全支持我們教會所推動的『教會大合一運動』……。大主教區已經與在大費城區舉行的葛培理佈道大會達成一個共識，就是葛培理佈道團會全面與我們的『教會大合一運動』立場一致。」

根據《費城諮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

的報導，大主教區派遣了40位受過訓練的陪談員到佈道會去。每一場佈道，所有天主教徒決志者都被指示到天主教陪談員那裡去，由他們帶返天主教教會。（《Calvary Contender》1992年7月1日）結果，那一次費城佈道大會，在決志的人中，約有1,900名天主教徒。他們的決志表全部被送到250個天主教牧區去接受跟進。這些天主教徒佔了決志者總人數的14%。（《The Catholic Standard and Times》星期四，費城，1992年7月16日）

1992年9月，葛培理在俄勒岡州（Oregon）的波特蘭市（Portland）舉行佈道大會。那一次天主教教會作出全面支持。根據《基督徒向天主教徒傳福音》一書所指出的，預計有10,000名陪談員出席訓練課程，而羅馬天主教教會卻定下一個目標，要鼓勵6,000名天主教徒參加。**所有決志者都被帶返天主教牧區。**（《Catholic Sentinel》1992年4月24日，由《基督徒向天主教徒傳福音》一書引述，1992年6月出版）在一次FM電台KBBM的訪問節目中，天主教的華舒曼主教（Walshman），和杜莉（Tulley）修女表示，這一次佈道大會是葛培理佈道團主動向他們作出邀請的。當電台的訪問員問及，天主教的陪談員是否會有機會將決志信主的天主教徒帶返羅馬天主教教會，杜莉回答說：「有啊！有啊！我們雙方都同意了。我就是保持經常與葛培理佈道團接觸的聯絡人。」（參Wilson Ewin的《代禱信》1992年5月28日）

1993年

1993年3月，葛培理飛到梵蒂岡去，與羅馬天主教教皇會面。這一次最少是第三次葛培理與教皇約翰保祿二世會面。葛培理說：「我常對教皇的熱情，和友誼，產生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說，教皇對他在德國愛遜（Essen）所舉行的佈道大會，深感興趣。當然這是因為葛培理將一定數目的天主教徒決志者，轉介回天主教教會去。（《Calvary Contender》1993年4月15日）

1993年6月，葛培理在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的匹茲堡（Pittsburgh）舉行佈道大會，有來自65個宗派1,050間教會的代表聚集在那裡。佈道大會的主席是聖公會的費他洛（Fred Fetterolf）。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中有六名是天主教徒。

在俄亥俄州（Ohio）哥倫布（Columbus）舉行的葛培理佈道大會中，天主教教會還是最積極參與的成員。（《Columbus Dispatch》1993年9月19日）

1994年

1994年6月，葛培理再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市（Cleveland）舉行佈道大會。這次佈道大會最特色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還有好幾個不信的搖滾樂電台聯合起來宣道（其中兩個是佈道團協辦的）。（《Calvary Contender》1994年9月15日）。在參與的1,005間教會之中，有100間以上是天主教教會，佔了區內所有的天主教教會百份

之六十以上。比勒主教（Pilla）在聖約翰大教堂的一場彌撒中說：「我們歡迎在葛培理佈道會中決志回歸的人，和剛剛信主的人。」

1994年12月，葛培理在《時代雜誌》中讚揚教皇約翰保祿二世說：「他將會在歷史上成為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教皇。他也成為整個基督徒世界強大的良心。」（參《時代雜誌》第54頁，由Paul Gary寫的《Empire of the Spirit》文章，1994年12月26日）

1995年

1995年10月，葛培理在加州的沙加緬度市（Sacramento）舉行佈道大會。這次大會由38個天主教牧區，和303間基督教教會聯合舉辦。天主教牧區也為大會提供陪談員。葛培理在第一晚就向教皇約翰保祿二世致意，說：「感謝神，教皇對今天社會的道德問題發出了勇敢的評論。」（《今日基督教》1995年12月11日）

1996年

1996年6月，葛培理於又在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明尼亞波利斯-聖保祿市（Minneapolis-St. Paul）舉行佈道大會。這次大會由119個天主教牧區，和269間信義宗教會參加。（參《今日基督教》1996年7月15日）。這個數字佔了教區內所有天主教教會的53%。相對於1973年葛培理在明尼亞波利斯舉辦的佈道大會來說，那一次完全沒有天主教教會參加，只有少數信義宗教會參與而已。這是何等大的轉變。聖保祿和明

尼亞波尼斯大主教區的夏利弗林大主教（Harry Flynn），囑咐所有神父都要參加佈道會，說：「務要領回那些失散了的天主教徒。」（Morpheus Clark著的《St. Paul Pioneer Press》1996年1月13日）。聖約翰諾曼（St. John Neumann）天主教牧區的羅拔舒華茲神父（Robert Schwartz）告訴記者說：他的牧區大約有60名天主教徒已經接受訓練做陪談員，為佈道大會的決志者做陪談工作。其中有一些訓練班是在天主教教堂中舉行的，不論基督徒或天主教徒，都放在一起受訓。他表示，初時有一些基督徒來到天主教堂會感到多少不安，但是教會大合一的觀念，最後也粉碎了他們這種不安的感覺。「我要他們告訴我，為甚麼坐在一間天主教堂裡會感到奇怪，為甚麼來到這裡會有困難？畢竟已經來到了，坐在一間天主教堂裡，豈不是一件好事嗎？」（《St. Paul Pioneer Press》1996年5月12日）。他又繼續說：「我沒有聽見他們有甚麼不同的意見。但有一些地方，我會向他們稍作補充的，例如社會公義成份、聖餐禮和禮拜儀式、聖禮的重要性…等問題。」

前明尼蘇達州的洲長兼「1996年明尼亞波尼斯葛培理佈道大會主席」艾祈（Al Quie），說：「最近，在邁亞美的克里夫蘭市（Miami, Cleveland）和其他城市舉行的佈道大會中，天主教徒都非常積極參與。」

1996年，葛培理在卡羅萊納州舉行的佈道大會，更有「猶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

派人士加入他的委員會。」（佈道會主席 Graeme Keith，《Charlotte Observer》1996年3月1日）

1997年

1997年1月，葛培理在接受納利甘（Larry King）的訪問時表示：他與羅馬有非常好的交往，又與梵蒂岡來往得很投契，而且差不多在每一件事上都與教皇持一樣的意見。

甘：「你對怎樣看其他教會？……例如摩門教、天主教、和在基督教概念內的其他宗派信仰？」

葛培理：「啊！我想我與他們全部都有很好的交情。例如……」

甘：「你與鹽湖城（摩門教）合得來？你與梵蒂岡（天主教）也合得來？」

葛培理：「我與梵蒂岡非常合得來。我已經探望過教皇好幾次。事實上，教皇就職的那個晚上，我正在他所牧養的克拉科（Krakow）大教堂裡講道。我是他的嘉賓……。 （而且）當他來到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之時……他還邀請我到講台上，與他一起講道。我講一個信息，他講另一個信息……但當時，我是在前往中國的途中，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

甘：「你喜歡這位教皇？」

葛培理：「我非常喜歡他……。我們差不多在每一件事上的意見都是相同的。」

由「守諾者」Promise keepers出版的1997年三至四月份《新人雜誌》（New Man）刊登了一篇訪問葛培理的談話記錄。（當時這份雜誌還是代表著「守諾者」發言的，現在不再是這樣。）以下是葛培理發表的關於天主教的談話：

「我年輕的時候，我對天主教認識不深。但這麼多年來，我交了很多天主教朋友。事實上，如果我們現在在一個城市裡舉行佈道大會，差不多所有天主教教會都會支持我們。（去年）當我們在明尼亞波尼斯（Minneapolis）和聖保祿（St. Paul）這兩個城市舉行佈道大會的時候，我們看見聖保祿本來以天主教徒為主，而明尼亞波尼斯本來以信義宗的基督徒為主，但他們都來支持那次佈道大會。這樣的事，在25年前是絕對不可能會發生的。」
（《New Man》雜誌1997年3至4月版的一篇文章，題為《Billy Graham in His Own Words：What the Evangelist Has Learned from a Lifetime of Ministry to the World》）

1997年5月30日，葛培理在一次訪問中告訴大衛科士（David Frost）說：「不論在浸信會教會裡、在聖公會裡、或在羅馬天主教教會裡，我都

感到好像回到家裡一樣。」很明顯，葛培理博士這樣說，是因為他以爲羅馬天主教的異端教義，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不肯以聖經的立場爲自己的立場。使徒保羅指示提摩太，要「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提前1:3）。羅馬天主教卻爲自己增添許多使徒所沒有傳講的教訓。保羅又指名道姓地警告提摩太，要防備假師傅，因爲他們的教導是錯謬的，是危險的。（提後2:16-18）

1997年6月，葛培理在德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舉行佈道大會。那一次，羅馬天主教教會與基督教49個宗派聯合，在佈道大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葛培理非常讚揚西班牙人和天主教徒合作，其中包括德薩斯州天主教高層的官員，帕特羅斯（Patrick Flores）大主教，他一開始就表示公開支持葛培理的佈道大會。「羅斯又親自與葛培理會面，並且錄製了一些英語和西班牙語電台的廣播片段，鼓勵更多天主教徒出席葛培理佈道大會，幫助他們對自己的信仰更委身。」（《今日基督教》1997年5月19日，第51頁）葛培理說：「魔鬼叫我們分開，但神卻藉著這樣的佈道會將我們所有宗派教會聯合在一起。」（《Calvary Contender》1997年6月1日）。但根據聖經，葛培理其實應該說：「神叫篤信聖經的基督徒與羅馬天主教的假福音分開，魔鬼卻藉著這樣的佈道會將所有宗派人士聯合在一起。」

根據《侯斯頓現代報》（The Houston Chronicle）的報導，羅馬天主教教會各方面都參與葛培理的佈道大會。報導又指出：「在基督教

領袖中，葛培理甚得各種不同神學觀點人士的尊敬，以致浸信會、天主教、和長老會…等教徒，早幾個月就前來，爲他所舉行的佈道大會，一同策劃、開會和受訓。」（《侯斯頓現代報》1997年3月30日）

1997年9月，當德蘭修女在去世的時候，葛培理稱她爲聖人。完全漠視德蘭修女在天主教彌撒中，拜威化餅爲耶穌基督，又教導她的病人向他們異教的神祈禱的事實。（參《德蘭修女是真基督徒嗎？》第12章）

「有好幾次，我有機會與她（德蘭修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榮幸。第一次是在加爾各答，在她所主持的『善終者之家』（Home of Dying Destitutes）中。記得那次是在日落時分，我與她在主裡有一個小時非常美好的相交。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地方的聲音、氣味和出奇的美麗。當德蘭修女進來歡迎我之時，我感到自己真像與一位聖人會面一樣。」

（參《Associated Press》由David Briggs書寫《德蘭修女譽爲聖人》一文。1997年9月6日）

1997年，在他的自傳《照我本相》（Just As I Am）中，葛培理清楚表明，他佈道的目標並不是要領人離開羅馬天主教：

「我經常澄清我的立場，我傳道的目標並不是要反對天主教的信仰，也不是要拉他們的羊離

開他們的羊圈。因為他們已經在天主教教會委身於基督，我為甚麼要改變他們的信仰呢？因此，我的目標反而是向那些從來未曾真正委身於基督的人傳福音。」（葛培理著的《Just As I Am》第357頁）

1988年

1998年6月，葛培理又在安大略省的渥太華舉行佈道大會。這次佈道大會可以說是有史以來天主教教會參與比率最高的一次。在56個英語教區中，有46個教區參與這次佈道大會。（參Bob Harvey在《Ottawa Citizen》報導的《Billy Graham's Catholic crusaders》1998年5月5日，第A1頁）當時，馬素佐弗斯大主教（Marcel Gervais）與葛培理一同站在講台上。佐弗斯說：「這次大會將會是一個很好的教會合一的經驗，使人們可以相信，我們確實是可以與其他教會一同合作的。」有一位葛培理佈道大會籌委員會的天主教委員，名叫哥斯亞（Rosemary Gauthier）也起來說：「我們希望這次佈道大會，能叫許多天主教徒再次委身，重返教會。」結果，天主教出動750人受訓成為陪談員。

1999年

1999年6月，葛培理又在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舉行佈道大會。這次大會得到畢之連大主教（Daniel M. Buechlein）全面支持。畢之連大主教鼓勵所有天主教教區前來參加葛培理的佈道大會。（《The Indianapolis Star》1999年6月3日）

同年十月，葛培理又在密蘇里州之聖路易市（St. Louis）舉行佈道大會。在一次接受傳媒訪問中，葛培理指出，他沒有興趣討論洗禮的問題，這樣的事與他無關。以下是他發表的意見：

「洗禮很重要，因為這是主耶穌教導我們要相信和執行的。但這是信徒個人和教會之間的問題。不同的教會在這方面都有不同的教導。我知道路德會、聖公會、或天主教教會都很強調自己的觀念，浸信會更加如此。但也有一些教會並不重視洗禮。因此，我讓他們有自由去教導他們想要教導的。我不是一個教授，也不是一個神學家。我只不過是一個單純的佈道家……，我要宣告的，是神愛你，叫你的罪得赦，使你可以上天堂。我的職責不是去做這些以外的其他事情。……我不是牧會的牧師，牧養教會不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是向每一個人傳揚福音，和讓他們選擇自己的教會，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或東正教、或甚麼別的教派。」

（葛培理接受Patricia Rice的訪問，《St. Louis Post-Dispatch》1999年10月10日）

這真是叫人感到驚訝的意見，證明葛培理怎樣公開地與聖經教訓背道而馳。他以爲甚麼形式的洗禮都可以接納，不論是嬰兒洗禮、重生的洗禮……，甚至不需要洗禮也可以。他簡直是不理會別人對他所講的有甚麼反應。他說，這不是他的事，神並沒有差派他來關心洗禮或「福音以外

的其他事情」。

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聖經那裡說過，葛培理有自由去傳與洗禮和其他聖經教訓無關的福音？這不是耶穌基督所吩咐使徒去傳的福音，也不是使徒吩咐初期教會去傳的福音。主耶穌的大使命是吩咐我們去傳福音，同時也吩咐我們要給信的人施洗，並教訓他們遵守主所吩咐的。請看如下的經文：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這就是主耶穌基督親自宣告的大使命。主吩咐我們要傳福音，及為信福音的人施洗，並訓練他們作門徒。葛培理沒有權柄將大使命分割，叫人自由去忽略其中的三分之二。

再者，其實福音本身也要我們按聖經的教導來施洗。假的洗禮只會破壞福音本身。例如，葛培理曾經說過，他可以接納天主教的洗禮。但他有沒有考慮到，天主教的洗禮是怎樣的洗禮。以下一段文字，是從《新天主教要理問答》（New Catholic Catechism）中括引出來的，可以解釋羅馬天主教教會所相信的洗禮是怎樣的一回事：

「主自己也確認洗禮是獲得救恩的必須途徑。……除洗禮之外，教會並不知道還有甚麼其他途徑可以保證人一定可以得到永生之福。這是為甚麼教會必須小心，不要忽略主耶穌所吩咐的使命，就是人人都必須『從水和聖靈重生』。因為神定意把救恩和洗禮綁在一起……。」
(《新天主教要理問答》1992年，編號1257)

「透過洗禮，所有罪都可得赦免。不論原罪，和個人所犯的一切罪，並所有由罪而來的懲罰，都得赦免。」
(《新天主教要理問答》1992年，編號1263)

「洗禮不但可以清除所有罪，還可以令皈依者變成『新造的人』、成為神所收納的兒子、『與神性情有份的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與基督同為後嗣的人、並成為聖靈的殿。」
(《新天主教要理問答》1992年，編號1265)

這就是羅馬天主教所相信的洗禮。請問，葛培理是否也相信這些？他相信救恩與洗禮綁在一起嗎？他相信洗禮可洗除一切罪污、叫人成為新造的人、賜人聖靈嗎？如果葛培理相信羅馬天主教的洗禮教義，他應該對自己誠實，加入天主教教會才對。

反過來說，如果他不相信羅馬天主教所教導的，如果他相信美南浸信會所宣告關於浸禮的教

導（他原是美南浸信會所按立的傳道人），他就應該譴責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定之為異端，又警告在他佈道會中所有決志信主的人，千萬不要與羅馬天主教扯上關係才對。以下是美南浸信會所宣告關於浸禮的教導：

「基督徒應該接受的浸禮，是奉父、子、聖靈之名，將全人浸在水中的浸禮。這是一個象徵信徒對主順服的行為，表示他願意相信一位被釘死、埋藏、又從死裡復活的救主；而信徒自己也向罪死了、將舊人埋葬了、又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這也是他信心的見證，表示他相信最後所有死人也要復活。」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963年5月）

這是說，基督徒不能中立兩可。羅馬天主教教導，洗禮是一個聖禮、是叫人得救恩的途徑，可以洗除人的罪，使人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浸信會卻教導，罪污只能因信耶穌基督而得到洗淨，浸禮只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見證**，表示信徒已經因著相信耶穌基督而得到救恩。羅馬天主教教導，只有藉著教會的聖禮，基督的救恩才能臨到罪人；浸信會卻教導，罪人可以直接從耶穌基督得到救恩，浸信會並沒有設立任何可以叫人得恩典的聖禮。他們所舉行的，是簡單的浸禮，和主餐禮，全是為了象徵，和紀念主耶穌基督完全的救恩已經臨到他們身上。

羅馬天主教教義與浸信會教義，可以說是天淵之別。使徒保羅說，真福音只有一個，任何人更改福音，必定受咒詛（加1章）。羅馬天主教與浸信會所傳的，是不同的福音。兩者之中，必定有一個是應當受咒詛的。普世教會大合一的理論絕對不能改變這個可怕的事實。

葛培理在聖路易市那次接受訪問之時，又說，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天主教的耶穌會修士已經來到聖路易市這裡「傳過福音」。

「這是耶穌留下給我們的責任，要我們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就是傳福音。這就是當時來到聖路易市的耶穌會修士所做的，他們實實在在是傳了福音。」

（葛培理，同上）

在此，我們再一次看見葛培理並沒有譴責耶穌會修士所傳的，藉著假聖禮來達成的，將功德和信心混合的假福音。這是何等的混淆！眾使徒花了許多時間警告我們，要小心防備假福音（林後11:1-4、加1章、西2章、約二書、猶大書）。葛培理卻完全沒有提出警告，反而認為所有傳「福音」的，都是傳同一個真福音。

1999年12月，葛培理接受聯合出版社（Associated Press）的訪問時，又說，他以教皇約翰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人」。根據葛培理所言，「過往二百多年來，沒有一位教皇像他帶來那麼大的供獻。」葛培理更進一步說：「我欽佩他的勇氣、果斷、才

智、和他對天主教、基督教、並東正教之間的分別的深度了解，以及他爲叫他們和好而作出的努力。」（聯合出版社，1999年12月17日）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葛培理對約翰保祿二世所傳揚的錯謬福音，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警告，結果誤導了無數人走錯路，落到永刑裡。

2000年

葛培理與羅馬天主教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從葛培理佈道團舉辦的「第三屆國際佈道者會議：阿姆斯特丹2000」（Amsterdam 2000,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vangelists）看出來。那次會議共有超過10,000名來自209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大會由2000年7月29日開始，至8月6日才結束。第一屆「葛培理阿姆斯特丹佈道者會議」是在1983年舉行，第二屆是在1986年舉行。但這一屆，葛培理因爲健康欠佳，所以不能出席。這次會議卻有超過300位講員，其中包括葛法蘭克連（Franklin Graham）、韓國的金培理（Billy Kim of Korea）、錫加拉克斯（Ravi Zacharias）、卓高信（Chuck Colson）、包樂（Luis Palau）、卑利布賴特（Bill Bright）、柏加（J. I. Packer）、史托德（John Stott）、和佐治加里（George Carey），他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大主教……等。這次大會的副題是「分離中的合一」（The Unity in Diversity）。這副題是爲強調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世代裡，再沒有一個人像葛培理這樣，將真教會和假教會之間的牆，拆毀得如此透徹。

在每一個普世教會大合一的會議裡，總有一個內置的矛盾。因為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人士們多認為，他們十分關注彼此間不同的教義。但同一時間，他們又不想將教義看為教會分離或分裂的原因。這在聖經真理上是絕對不可能的。根據聖經，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摩3:3）但推動普世教會大合一運動的人士以為，他們能人所不能，這便是我們在「阿姆斯特丹2000」裡所看到的。可是，那次會議的領袖們和講員們，人人都聲稱自己深切地關注教義性的真理。例如，8月1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就有以下的報道，說：「會議的頭兩天，大會的討論內容都集中在神學和教義的問題上。」有一組神學家，由柏加（J.I. Packer）和比遜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的提摩太佐治（Timothy George）領導，他們負責為大會草擬一份「信仰宣言」，等大會結束時才公報的。柏加在這份宣言裡表示：「我們必須說明全部真理。有一些事情，我們沒有按↓應有的嚴肅態度處理……現在我們實在面對著一個將福音縮到最小的危機。」柏加雖然這樣說，他卻仍然站到「福音派與天主教在一起運動」（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movement）的最前線，要與大異端天主教聯合在一起。當柏加的朋友多馬夏活（Thomas Howard，他與柏加曾經聯合寫過一本書）宣佈於1985年加入羅馬天主教教會之後，柏加在接受《今日基督教》訪問時作出如下的表示：「我不認為，成為一個天主教教徒，與成為一個自由神學教徒，是相同的悲劇……在這些年日間，我認為天主教徒是我們福音派基督徒可以找到的最忠

心、和最剛強的弟兄。」（《今日基督教》1985年5月17日）柏加支持卓高信寫成1992年出版的《基督的身體》（The body）一書，這本書鼓吹福音派、天主教、和靈恩派聯合起來，又視天主教教會為基督身體的一部份。柏加也是1994年《福音派與天主教在一起》宣言的一位簽署者。1995年10月12日，《今日基督教》為這件事訪問過柏加，柏加表示，關於救恩與教會的不同意見，不應該阻礙福音派與羅馬天主教教會聯合的行動，好讓我們「將北美洲這個環境再度基督教化」。為了交待他曾經參與簽署《福音派與天主教在一起》宣言，他作一個這樣的總結，說：「我到現在依然為支持這個宣言而感到高興。」1998年7月31日，在愛爾蘭的都柏林（Dublin）的一個聚會裡，柏加提及教皇約翰保祿二世，認為他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Take Heed Ministries, Belfast, North Ireland, 1999年3月）。其實教皇既然相信一個被神咒詛的、錯謬的福音，又視自己為「世上甜蜜的基督」，又向馬利亞禱告，視她為天后，和協助基督完成救贖工作的女救贖主，他怎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呢？

何等混淆！

英國聖公會的領袖約翰史托德（John Stott），又是另一個令人感到混淆的例子。他對會議說：「忽略聖經等於忽略基督。」又為這個世代「越來越沒有深度、到處看到的，都是外表化的現象」而感到悲哀。可是同一時間，他又說：「我們福音派太過注重教義了。」我們卻認為他持這種普世教會

大合一的立場是不對的、是矛盾的。我們怎可能一方面重視聖經真理，另一方面又避免將真理看為教義？史托德與柏加一樣，站在福音派與天主教運動的最前線。1977年4月，他在英國舉行的「第二屆國際福音派聖公會會議」（The 2nd National Evangelical Anglican Congress）中，對著2,000位福音派領袖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將所有自稱為基督徒的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有形體的合一……並且福音派基督徒也應該與英國聖公會基督徒聯合起來，共同努力，從而進一步與羅馬天主教教會全面合一。」（Arthur Johnston著的《為普世界福音主義而戰》，第328頁）1977年7月8日出版的《今日基督教》也證實這段話。因為由1977年至1984年，史托德在「福音派與羅馬天主教為宣教事工對話」（Evangelical-Roman Catholic Dialogue In Mission）中，是一位主要的參與者。史托德有一位同工，名叫米高夏柏（Michael Harper，他在史托德所牧養的『諸靈堂』中做助理牧師），他在1977年出版一本書，名叫《三個姊妹》（Three Sisters）。這本書形容「三個姊妹」在爭吵不休。這三個姊妹分別是，「福音派姊妹」（Evangeline）、「靈恩派姊妹」（Charisma），和「羅馬姊妹」（Roma）。他認為，這三個姊妹應該盡快和睦相處，不要再爭吵。當教皇約翰保祿二世於1982年到訪英國的時候，他被邀請到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來參加一個教會大合一運動的崇拜。在崇拜中，史托德這樣說：「看來，在這樣的聯合崇拜中，背誦使徒信經是對的。因此，再度確認我們之間共通的洗禮信仰，也是正確的。」（參Malcolm Watts所著的《Sword and Trowel》，其中一

文：《The Crumbling of Evangelicalism》，1987年出版）

史托德告訴阿姆斯特丹一位記者，說：有很多事情都是不應該當作教義來處理的，例如「浸禮、教會管理、屬靈恩賜、和究竟落地獄的靈魂是否會在地獄裡永遠受苦，還是最後被消滅……等問題。」聖經對於這些問題交待得很清楚，但史托德卻認為，我們不應該為這些教義起爭論，目的是為了可以更廣闊地與不同信仰的人相交。這就是公開地違背聖經的教訓。保羅吩咐提摩太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提前6:13）這表示，連命令的細節也要守住，看為極之重要。要就是每一條教義都視為重要，否則就是全部都不重要；假若每一條教義都重要，它就須要堅守為教義，並且為了保衛它而不惜與假教義為敵。每一個傳道人都必須作出這樣的一個決定，不是限制教義，便是限制相交。他不能一方面表示相信和支持神全部的計劃（徒20:27），另一方面又喜愛廣泛地享受與異端相交。如果他堅持要有廣泛的相交，他就必須限制自己關注教義。

加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佐治加里（George Carey）也是另一個「阿姆斯特丹2000」會議中教會大合一運動的混淆例子。加里原是英國和蘇格蘭聖公會的領袖。在這樣的地位上，他有機會與差不多每一種異端和道德敗落的事拉上關係。因為聖公會裡頭有數以千計的同性戀者，

其中不少還公然參加同性戀光榮遊行，爲要爭取他們的「權利」。此外，在聖公會裡，同性戀「神職人員」也有不少。很多聖公會神職人員否認和質疑耶穌基督是由童貞女所生、耶穌基督的代贖教義、並耶穌基督的復活。因此，加里實在沒有資格向一群自稱是忠於聖經真理的佈道家講道。然而，他竟然被邀爲阿姆斯特丹「第三屆國際佈道者會議」最主要的講員之一。怪不得他在講道中公開表示，認爲「所有相信三位一體真理的教會，在法理上都是屬於基督的身體。」他的意思是承認羅馬天主教教會也是屬於耶穌基督的真教會。他又進一步說：既然福音派和天主教「都有這麼多共通的地方」，所以他認爲彼此應該爲普世教會爲大合一運動而對話。可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卻相反，他指出：任何傳假福音的人都是應當受咒詛的（加1章）。這一點是真的，即使傳假福音的人也相信三位一體教義，也不能避免受咒詛。

普世教會大合一主義者卻認爲，教義不是用來分裂教會的。這一點絕對是錯誤的。教義的設立，本來就是爲了與異端分開。純正的基督教信仰，原先是由受聖靈感動的使徒們傳給我們的，後來他們將這些信仰真理寫成新約聖經，稱爲「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猶3章），凡屬神的子民，都有責任將這真道傳給下一代（提後2:2），並要竭力爭辯，使真道不變，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爲止。（太28:18-20；猶3章）保羅提醒提摩太，不要容許任何人傳「異教」。（提前1:3）要使真理不變，教會就不能不走窄路，真理就不能不視爲教義。這就是聖經將這些教義表達

出來的方式。不錯，當我們嚴謹地處理這些教義的時候，這種態度確實會造成持相反教義觀點的人彼此分開，但是神的旨意也確實要我們如此。

爲了堅持普世教會大合一的立場，而將合一放在教義之上，是不合聖經，也是不順服聖經的。但葛培理佈道大會在世界各地所推動的，正是這樣的方向。

與羅馬天主教合一的欺騙

我們已經看過，打從1950年代開始，葛培理已經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緊密地合作。事實上，他與紅衣主教善富頓（Fulton Sheen）的親密關係，可以追溯至1944年；而且他與波士頓大主教理察古盛（Richard Cushing）的關係亦可以追溯至1950年。雖然在「阿姆斯特丹2000」的會議，他以低調來處理與羅馬天主教的關係，其實是因為很多代表都是從自西班牙、葡萄牙、並其他天主教國家的福音派教會派來的。這些人都以羅馬天主教爲異端。當歐卓處（Utrecht）的大主教阿基恩佐亨勒斯（Adrianus Johanus）在大會中，起來歡迎各教會的代表來到阿姆斯特丹大會的時候，大會發給所有需要收聽西班牙語翻譯之人士一封通知信，表示大主教佐亨勒斯的信仰並不代表葛培理或他的佈道團的信仰。這封通知信並沒有發給一般收聽英語，而無須翻譯的會眾。這是說，大會的領導人故意要使西班牙語的福音派代表們相信，今次大會雖然有天主教的主教出席，但大會並沒有接納他們的信仰。他們之所以邀請這些

主教出席，純粹是爲了禮貌上的需要而已。大家不需要視天主教的主教爲一個真基督徒。如果葛培理是誠實的，他就應該向那些西班牙語的福音派代表們承認，他向來都喜愛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相交，而且曾經與他們長時間緊密地合作，他也常常公開讚揚教皇和大主教之類的天主教領袖，並且他對待這些披著羊皮的狼，像基督裡親愛的弟兄一樣。

葛培理的佈道團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玩弄「兩面人」的手段。他們盡可能隱藏自己與羅馬天主教的緊密關係，不讓福音派的支持者知道。特別是從1950年至1980年這段日子更是這樣。到了1980年代以後，葛培理才在訪問他的人面前，公然承認，他愛上了羅馬天主教。

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實，而是多年來，一直顯明葛培理的哲學和處理方式的事實。這五十多年來，葛培理一直將佈道會的決志者轉介到天主教教會去，又接受天主教大學頒發給他榮譽學位，又用叫人感到驚訝的稱讚來奉承教皇，又探訪過教皇約翰保祿二世多次，向他尋求寶貴的意見。在福音派的世界裡，葛培理將天主教的地位建立起來的功勞，是沒有人可以與他相比的。

在我們這一代，甚至可能在整個歷史中，葛培理比任何人都有機會向更多的人傳福音。但當他站在神面前要交賬的時候，他要爲眾多被他欺騙，接受他錯謬的普世教會大合一思想，最後被他轉介到假福音信仰的教會如天主教去的人，受神嚴厲的審判。

對於那些與錯謬聯合，和跟隨假師傅的人，我們要向他們響起警號，警告他們，新福音派主義不單在教導上錯誤，更嚴重的錯誤是在於它拒絕承認自己走錯路，還堅持繼續與錯謬的教派相交。在我們來說，如果我們不提高警覺，反對妥協主義，我們就是出賣主的叛徒。親愛的弟兄啊，「當遠離虛假的事。」（出23:7）